

晚清文化界對於 David Livingstone 與非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

顏 健 富*

摘 要

本文追蹤一位鮮少受到晚清研究者注意的蘇格蘭傳教士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與其著作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在晚清的接受與傳播情況。學界已關注到米憐、麥都思、馬禮遜、郭實臘、理雅各、裨治文、林樂知、傅蘭雅、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可是卻忽略曾因讀郭實臘 *Appeals of China* 而有意到中國傳教的立溫斯敦。立溫斯敦因鴉片戰爭的爆發而改到非洲，大幅度揭開不為西方世界所知的非洲內陸，引發各方矚目。立溫斯敦的「非洲探勘記」譯入晚清文化界，分別名為《黑蠻風土記》與《泰西風土記》。本文根基於一批不受矚目的史料與文學材料，探索譯本的發生語境、意識型態與詩學結構，以及其所折映的意義，重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其人其事的接受與傳播概況，填補學術空白。

關鍵詞：立溫斯敦、非洲、冒險、晚清、翻譯

一、前言：從死亡說起

1873年5月，在非洲傳教與探險數十年的立溫斯敦¹(David Livingstone,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 關於 David Livingstone 的中文譯名甚多，本文正文統一為「立溫斯敦」，針對引文部分，一律遵循原著採用之譯名。

1813-1873) 被發現死於尚比亞 (Zambia) 伊拉拉 (Ilala) 房舍。僕人朱瑪 (Chuma) 和蘇喜 (Susi) 剖開其軀體，取出心臟，葬於名為普敦 (mpundu) 的樹下，再以布裹其遺體，長途跋涉，抬到港口，運至英國，葬於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其墓碑銘刻：「他將三十年的時光致力於教化土著、探索未發現的秘密、廢除破壞性的中非販奴貿易」。² 隨著十九世紀的局勢演變，文化全球性流動的路線逐漸延伸到中國版圖，如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四百週年國際紀念會、萬國博覽會等，都可見到中國文化界或主動或被動捲入世界知識分享的結構，共享某些紀念儀式與慶典。就在英美各界悼念立溫斯敦時，1870 年代由美國教士丁韋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英國教士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和包爾騰 (John Burdon, 1826-1907) 等人在中國主編的《中西聞見錄》，闢有「各國近事」一欄，刊登立溫斯敦的訊息：「茲查斯敦之死，在去年三月間。身後成斂，皆賴義僕黑奴料理一切，復將其柩護送回英，陸行四閱月，始抵海岸。其時英國業已專派輪船，守候接靈，抵英後，令國會大臣，督理喪葬事宜，備極優渥，復奉命，葬於昭賢堂 (堂名微斯珉斯得阿貝，英京最著之禮拜堂也)。此堂創於唐太宗時，相傳千二百餘年，歷代增修展拓，國人尊為聖所。」³ 報導中的翻譯術語與訊息未必精準，⁴ 卻頗能反映彼

2 關於立溫斯敦過世由從人運送至英國的概況與其墓誌銘，可參見「西敏寺」官方網站：<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our-history/people/david-livingstone> (2014.3.28 上網)。其墓誌銘以英文大寫字母呈現：“BROUGHT BY FAITHFUL HANDS OVER LAND AND SEA HERE RESTS DAVID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LER, PHILANTHROPIST, BORN MARCH 19. 1813 AT BLANTYRE, LANARKSHIRE, DIED MAY 1, 1873 AT CHITAMBO’S VILLAGE, ULALA. FOR 30 YEARS HIS LIFE WAS SPENT IN AN UNWEARIED EFFORT TO EVANGELIZE THE NATIVE RACES, TO EXPLORE THE UNDISCOVERED SECRETS, TO ABOLISH THE DESOLATING SLAVE TRADE, OF CENTRAL AFRICA, WHERE WITH HIS LAST WORDS HE WROTE, “ALL I CAN ADD IN MY SOLITUDE, IS, MAY HEAVEN’S RICH BLESSING COME DOWN ON EVERY ONE, AMERICAN, ENGLISH, OR TURK, WHO WILL HELP TO HEAL THIS OPEN SORE OF THE WORLD.””

3 清·丁韋良，〈各國近事〉，《中西聞見錄》第 23 期 (1874)，頁 23。

4 如「微斯珉斯得阿貝」的「阿貝」(Abbey) 非專用語，不該音譯，應譯成「微斯珉斯得寺院」，也是如今泛稱的「西敏寺」。「相傳千二百餘年」亦有誤，該寺建於公元 960 年，距離新聞發表的時間未滿千年。

時中國文化界經由新興的出版管道，接收發生於「非洲→英國」的消息：立溫斯敦屍體的運送、葬禮儀式等，且隨著一系列紀念性文章，開啓中國人對立溫斯敦與其「非洲探勘記」的認識。

雖然，中國人士早有親歷或行經非洲的紀錄，如 1707 年，樊守義（1682-1735）隨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1720）赴歐時路過好望角，著有《身見錄》；從 1782 至 1795 年，謝清高（1765-1821）曾隨國外船隻到非洲，口授《海錄》，記述妙哩士（Maortius）、峽山（好望角，Cape Point）、散爹哩（St. Helena）等地。⁵十九世紀，中國人士到非洲的案例趨增，如 1841 年回教徒馬德新（1794-1874）到麥加朝聖，又到開羅居住半年，著有《朝覲途記》，記載埃及金字塔與穆罕默德·爾里（Muhammad Ali, 1805-1867）的政治改革；⁶1859 年，郭連城（1839-?）由海路直達蘇伊士、再由蘇伊士坐火車經開羅至亞歷山大，著有《西遊筆略》，對開羅古蹟多有描寫。⁷不過，其內容多止於沿海一帶或埃及大城，較無內陸記載，正如彼時西方世界對非洲的有限理解。王韜（1828-1897）〈探地記〉指出「若洲之內地，從未有人深入之者，故洲內風土人情，外人莫得而詳也」，而立溫斯敦「直達東西兩境海濱」，⁸準確評估立溫斯敦「探地」的意義。立溫斯敦曾穿越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先後探入貝專納（Bechuanaland，今稱波札那，Botswana）、蓋米湖（Lake Ngami）、安哥拉（Angola）、坦噶尼諾（Tanganyika，今屬坦尚尼亞）、尼亞薩蘭（Nyasaland，今屬馬拉威，Malawi）及莫三鼻（Mozambique），奠定「探地」之里程碑。

-
- 5 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釋，《海錄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 60。
 - 6 《朝覲途記》：「謎思爾，巨城也。時母罕默德·爾里為王。王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謎思爾，修墓樹，蓄貨值，各種技藝，由甫浪西習來。諸凡製造，無求於他國。」清·馬德新著，馬安禮譯，《朝覲途記》，《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第 95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 361。
 - 7 《西遊筆略》：「加以羅城內，有最奇之古跡，狀如塚，皆石爲之，闊下而銳上。其最大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長約六十丈，高亦六十丈，內有古人之棺，不知何代所建。」清·郭連城，《西遊筆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頁 131。
 - 8 清·王韜，〈探地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9954。

相較晚清歷史或文學研究者已陸續關注的米憐 (W. C. Milne, 1785-1822)、麥都思 (Walter Medhurst, 1796-1857)、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郭實臘 (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理雅各 (Jame Legge, 1815-1897)、裨治文 (E. C. Bridgman, 1801-1861)、林樂知 (Young J. Allen, 1836-1907)、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等傳教士,「立溫斯敦」幾乎乏人問津。立溫斯敦曾因閱讀郭實臘《中國的呼聲》(*Appeal of China*) 而深受鼓舞,有意至中國傳教,卻因鴉片戰爭的爆發,1840 年底改往非洲。⁹立溫斯敦與中國的因緣並不因此中斷,反而透過新聞傳播、出版業與傳教士等管道而又有所牽連。

立溫斯敦的非洲記述共有兩部:1857 年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記錄 1840 年至 1856 年橫跨非洲東、西兩岸的傳教探勘歷程。1865 年,他將備受責難的二度非洲探勘記出版為 *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Zambesi and its Tributaries*。1874 年,就在立溫斯敦過世後,旁人將他最後七年的日誌整理為《立溫斯敦在非洲中部的最後行旅》(*The Last Journals of David Livingstone in Central Africa*)。其傳入中國的著作乃是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開啓非洲內陸的風土民情、部落體制等面貌,1879 年被譯成中文,名為《黑蠻風土記》,迄今為止,乃是中文學界唯一的立溫斯敦著作譯本。遺憾的是,無論中西學術圈,鮮少論及此譯本。

筆者有意重探該譯本的發生語境與其反映的內涵,並且重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其人其事的接受與傳播情形,填補學術空白。本文並非「立溫斯敦」的專門研究,¹⁰ 卻是側重於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

9 David Livingstone, "Introductio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a Sketch of Sixte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a Journe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Loanda on the West Coast; Th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 Down the River Zambesi, to the Eastern Ocean* (New York: Harper, 1858), pp. 7-8. 本文所據者為收藏於大阪京都國際日文文化研究中心的 1858 年之版本。

10 關於立溫斯敦的研究或傳記,英文版已有不少,如 William Garden Blaikie, *The Personal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 Chiefly from His Unpublished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in the Possession of His Family* (New York: Harper, 1881); Thomas Hughes, *David Livingstone* (London: Macmillan, 1891); Henry Walton, *Livingstone: Fifty Years After* (London: Hutchinson

斯敦的接受、翻譯與傳播狀況。在論文結構上，先從現有材料重探譯本的發生概況，試圖勾勒自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到《黑蠻風土記》/《泰西風土記》的翻譯進程，當中涉及晚清幼童留美計畫、新聞訊息全球化流動、中國報刊崛起等脈絡背景；其次，就《黑蠻風土記》的翻譯實踐，分成數層面，先後探討譯本在譯者的意識型態、詩學結構下的變動，當中包含彼時迅速傳播的殖民論述與中國固有的禮教傳統、文人逞才肆情的慣性與誇大渲染的文學筆調等而形成的「非洲」形象；最後，本文就新聞、議論、小說、傳記等不同媒介與文體等材料，探及晚清人士因不同的位置而對「立溫斯敦」投射的視野，反映特定的需求或期許。

二、譯本的發生：從留美學生計畫到世界地理學的傳播

立溫斯敦雖因鴉片戰爭而與中國失之交臂，但其非洲探勘記卻譯入中國，隱藏著一可以反映彼時外交、教育與世界觀等訊息的文化地圖：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留美學生計畫、西方傳教士的文化傳播、中國文人身分的轉變、早期的意譯模式與世界輿地叢書的編輯等。本節將藉由各種材料的追蹤，勾勒譯本的發生語境與其反映的思潮。

從《黑蠻風土記》的目錄頁，可見作者欄的紀錄：「英國立溫斯敦著，南海史錦鏞瑞臣譯語，山陰沈定年飽山述文，武進陳以真璞卿校字。」晚清「譯語者」未必精通中文，而「述文者」未必精通外語，如林紓（1852-1934）經由曾宗鞏、魏易、陳家麟等人口述後再以文言體翻譯的西方小說便是一例。¹¹ 依譯本的生產脈絡，沈定年附於譯本之〈序〉提供寶貴的訊息：

& Co, 1925); Jeanette Eaton, *David Livingstone: Foe of Darkness* (New York: W. Morrow, 1947); Rob Mackenzie, *David Livingstone: The Truth Behind the Legend* (Eastbourne: Kingsway Publications, 1993) 等。中文版傳記則有：張文亮，《深入非洲三萬里——李文斯頓傳》（臺北：校園書房，2003）。這些傳記都未涉及中文界對於立溫斯敦的接受視野。

11 此如林紓與曾宗鞏合譯《埃及金字塔剖屍記》（*Cleopatra*）、《斐洲煙水愁城錄》（*Allan Quatermain*）、《蠻荒志異》（*Black Heart and White Heart, and other Stories*）、《三千年豔屍記》（*She*）、《鐘乳骷髏》（*King Solomon's Mines*）等；與魏易合譯《玉雪留痕》（*Mr. Meeson's Will*）、《埃斯蘭情俠傳》（*Eric Brighteyes*）、《橡湖仙影》（*Dawn*）、《紅礁畫槳錄》（*Beatrice*）、《洪罕女郎傳》（*Colonel Quaritch, V. C.*）；與陳家麟合譯《璣司刺虎記》

戊寅夏尊聞閣主人屬史君瑞臣，譯其語節取而選存之。史君以方言館生游學倫敦，以歸盡通西文義例，而自幼出洋，未嘗習中學，因以文屬余。余就其語擇貫屬者，析為條目，凡六十餘則，而以原圖并屬於後。至其敘載實事，羅舉名物，率皆平淡無奇，或隨其語音繙為華字，不能索解，兼乏考據之功，則皆仍立溫斯敦之原文，而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閱斯編者聊藉以知海外之風氣可也。歲在屠維單閼，秋八月既望山陰沈定年識。¹²（〈序〉，2a）

上述引文雖反映近代留學生計畫對譯本的推動作用，不過，文中多處有待斟酌。根據近代中國留學生資料，史錦鏞並非留英，而是留美，屬 1872 年第一批泰西肄業計畫的三十位學生之一。此計畫由廣東香山人、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闈（1828-1912）倡議，獲丁日昌（1823-1882）、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等人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自 1872 年開始，分批派遣中國官費留學生，學習軍政船政等洋務，前後進行十年。¹³ 這批赴美學生幾乎複製容闈的模式：先到麻省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接著分發各大學。留學生背景大多是容闈的同鄉或是地緣相近者，¹⁴ 1858 年出生香山的史錦鏞即是其一，年約十四歲，比起同批幼童略長，出國前對中學應有接觸，而非序文所謂「自幼出洋，未嘗習中學」。就孟松學校畢業簿，可見史錦鏞的中文留言：「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

（*Jess*）、《古鬼遺金記》（*Benita*）、《鐵匣頭顱》（*The Witch's Head*）、《炸鬼記》（*Queen Sheba's Ring*）等。

- 12 清·沈定年，〈序〉，收入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黑蠻風土記》（出刊地與出版者未詳），頁 2a。原版未註明刊地與刊者，根據其序文「歲在屠維單閼」，可推算是 1879 年出版。本文所據乃是收藏於韓國首爾「奎章閣」的原版本（見圖一：《黑蠻風土記》1879 年版目錄頁）。該書並非每頁都可見到編碼，本文所列頁數乃是經由推算，具體出處以「條目」名稱為準。為避免繁瑣，凡引用此文本，一律在引文後括弧註明篇章與頁數，不另標註。
- 13 關於留學生計畫的研究，可見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錢綱、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田正平主編，《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等。
- 14 關於幼童的地緣分析，可見 Edward J. M. Rhoads, “Recruitment,”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pp. 13-30.

思親」，與英文留言：「聖經 你的指南」，落筆時間為「1875 年 10 日 29 日」，反映其掌控中英雙語的能力。¹⁵1877 年，史錦鏞因違規而成爲首位被遣返的留美生。¹⁶

雖然，史錦鏞未必是近代留美計畫的範例，不過卻仍可見該計畫促成中國留學生接觸「立溫斯敦」的契機。史錦鏞長達五年的留美時間（1872-1877），恰是歐美媒體熱切關注立溫斯敦的時刻，無疑替 1879 年出版的中譯本提供了一背景。十九世紀 70 年代，深入非洲探勘的立溫斯敦音訊杳然，謠言四起，甚至傳出噩耗，消息來源甚至包括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與美國駐桑吉巴（Zanzibar）大使館。立溫斯敦撲朔迷離的行蹤直到 1871 年才撥雲見日：由美國極具影響力的媒體《紐約先驅報》（*The New York Herald*）派遣的戰地記者施登萊（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於 10 月 23 日在烏濟濟（Ujiji）見到疾病纏身、骨瘦如柴的立溫斯敦。該報以跨頁形式大幅報導兩人的相遇，藉由傳奇事蹟的渲染，吸引大眾目光。¹⁷就在施登萊返回英美後，立溫斯敦拒絕離開，繼續在荊棘泥濘中探勘尼羅河（the Nile）源頭，1873 年客死異鄉，留下未竟之志，引發歐美各界對立溫斯敦的廣泛哀悼。

在文化訊息全球化的年代，此一在英美發酵的消息隨後傳到報業正蓬勃發展的中國。自 1815 年在馬六甲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以降，即可見各種以「世界」爲名的中文報刊，如《各國消息》（1838）、《遐邇貫珍》（1853）、《六合叢談》（1857）、《中西聞見錄》（1872）等，大多由傳教士主持，向中國讀者介紹不同於傳統「天下」觀的新世界觀，「在以『鼓勵有志與才智之士』，『介紹世界歷史及西洋知識，用以喚醒本人』宗旨下，紛紛闢出時事專欄、地理專欄、工商行情專頁、雜記等

15 2002 年，錢綱赴美查獲早年留美幼童的原始資料，其中之一便是發現孟松學校畢業留言冊與收錄各種剪報、資料的檔案匣。錢綱、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頁 96。

16 根據 Edward J. M. Rhoads 對於幼童檔案匣的研究，指出史錦鏞因爲欠債而遣返中國。Edward J. M. Rhoads, "The American Host Familie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p. 64.

17 1872 年，《The New York Herald》以跨頁篇幅報導，證實該報記者施登萊尋得立溫斯敦的消息，強調過程之困難，附上立溫斯敦失蹤期間的行跡地圖。"LIVINGSTONE: Herald Special from Central Africa Finding the Great Explorer," *The New York Herald* (1872.7.2): 1-3.

欄目，報導國內外大事」。¹⁸《中西聞見錄》闢有「各國近事」一欄，發表各國新聞，1872年第5期報導立溫斯敦「探尋尼祿河源數年未歸，久無音問」、「去歲美國斯但利前往，將伊所繪圖籍及家報寄回」的消息。1874年，《中西聞見錄》第23期報導立溫斯敦的噩耗：「茲查斯敦之死，在去年三月間。」¹⁹除傳教士的推波助瀾外，作為第一任駐外公使的郭嵩燾（1818-1891），出發英倫處理「馬嘉理事件」的前一年，曾於「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提及：「倫敦《特力格訥菲》新報局與美國紐約之《赫拉爾得》新報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起自阿非利加之東曰桑希巴爾，經西出鋼戈江，計程約萬餘里，周歷至三年之久。英人屢次游探不能入，至是始一覽其全。」²⁰曾於1867年至1870年遊歷歐洲並且旅居蘇格蘭（立溫斯敦之母國）的王韜（1828-1897），撰文〈探地記〉，高度肯定立溫斯敦在地理探勘上的重大貢獻：「其考求內地之功，非人所能及也」。²¹

從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士大夫與知識分子，顯示1870年代不同身分的人士對於立溫斯敦的關注，創造了中譯本誕生的氛圍。1877年，被遣返中國的史錦鏞年約十九歲，正是大展鴻圖之時，若就其返回途中的剪辮子、穿西服等行徑來看，相當程度反映他對西方文化的接受。²²1870年代正值「申報館」擴展勢力之時，以「尊聞閣主人」為筆名的《申報》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 1830-1908）聚合培養一批才華洋溢的中國文人，如作為《申報》「總纂」的蔣其章（芷湘）以及「主筆」的錢徵（昕伯）、何鏞（桂笙）、沈定年（飽山）、蔡爾康（紫絨）等人。序文中的「尊聞閣」，指向以《申報》為大本營的團隊，乃是一批崛起於上海文界「從傳統文化人轉變為新型文化人」的

18 祝均宙，〈中國近現代中文期刊概述：發展脈絡及特色〉，《上海圖書館館藏近現代中文期刊總目》（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4），頁1590。

19 清·丁璉良，〈各國近事〉，《中西聞見錄》第5期（1872），頁20-21；第23期（1874），頁23。

20 清·郭嵩燾，《巴黎與倫敦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6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339。

21 王韜，〈探地記〉，頁9954。

22 根據錢鋼的研究：「史錦鏞奇怪地消失了。直到在上海復旦大學查閱《李鴻章未刊函稿》時，我們才知道，就在給女生寫信的第二年，史錦鏞被清政府召回。原因不詳。但肯定是『犯錯誤』了。在回國的半路上，史錦鏞剪了辮子，改穿了西服，李鴻章說『情殊可惡』。」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頁97。

團體，²³除編報辦刊外，以文會友，創作竹枝詞、應酬詩詞等，編有《尊聞閣同人詩選》。核對沈定年〈序〉之「戊寅夏尊聞閣主人屬史君瑞臣」與文末「歲在屠維單闕，秋八月既望山陰沈定年識」，可以推論：遭遣返中國的史錦鏞來到印刷業與出版業發達的上海，正逢西學擴張之時，孔需精通外語之士，1878年（戊寅）夏天，受尊聞閣主人委託翻譯的任務。史錦鏞雖通外語，可是中文程度應不及土生土長的中國文人，因而「譯語」後，又由沈定年「述文」與陳以真「校字」，完成時已是1879年（屠維單闕）的秋天。

作為述文與校字的沈定年與陳以真顯然比起史錦鏞更具深厚的中學能力。沈定年是《申報》的主筆之一，曾編以詩詞為主的《侯鯖新錄》，輯錄各種闡釋《易》、《詩》、《書》、《禮》、《春秋》等文章的《經藝新畬》，反映舊式文人的審美趣味與深厚的中學基礎。陳以真則是校訂過申報館重印出版的古典書籍，如1878年仿聚珍板本排印的西泠野樵《繪芳園》之卷末有「武進陳 眞璞卿氏校訂」字樣，²⁴《儒林外史》申報館第二次排印的巾箱本（簡稱「申二本」）五十六回末有「武進陳以真 璞卿氏校定」字樣。²⁵相比起「校字者」陳以真，「述文者」沈定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替譯本寫出洋洋灑灑的〈序〉。

沈〈序〉一開始便破解傳統「以華夏而包蠻夷」的「天下觀」，指出「泰西風俗，其人好游歷，地面一周，知自東而西，可更極西而還反乎東？而地球乃有定形，四洲之名，歷歷可指矣」。沈定年拋開民族尊嚴，以不同於傳統「天下觀」的論述模式，彰顯立溫斯敦著作的優勢：「西人行事，雖萬里之遙，千金之費，輒不憚煩勞，必試行之而後心快意慊。且其著書立說，又必躬踐其地，親見其事，而後託楮墨以發為言；中土儒者足不出戶庭，而矜言

23 此一轉變的過程如熊月之所言：「從傳統文化人轉變為新型文化人，是個緩慢的過程，在很多人身上看不出明顯轉變的環節。我們很難說某人是從那一年開始就由傳統文化人變成新型文化人了。而且，這個轉變也是相對而言的，在很多人身上，其實是新舊一體，亦新亦舊，半新半舊，有新知識，新觀念，也有舊習氣，老傳統。」熊月之，〈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彙聚〉，《近代史研究》1997.4: 264-265。

24 清·西泠野樵，《繪芳錄》（《晚清民國小說研究叢書》第43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頁1051。

25 李漢秋，〈《儒林外史》的版本及其沿遞〉，《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8。

著述，事不經閱歷，而臆造端倪，故說部之書，十九僞託。求其以空閒之歲月，作汗漫之游蹤，歸而記載，傳信後世，古今以來，杳不多覩。以視此書之實而有徵，奚啻霄壤。」（〈序〉，2a）

當沈定年面對有別於中土「臆造端倪」的「實而有徵」之著作時，以相當的自覺意識強調自己的翻譯原則：遇到「不能索解，兼乏考據之功」時「則仍立溫斯敦之原文，而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早在嚴復（1854-1921）與魯迅（1881-1936）提出「信達雅」、「硬譯」原則之前，十九世紀 70 年代的譯者實已觸及翻譯真實性 / 自覺性的議題。可是，翻譯原則未必等同於實踐結果，類似「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實更接近於彼時譯者競相出現的空泛宣言，尚難擺脫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翻譯作品普遍出現的「意譯」模式。²⁶ 經由史錦鏞的「譯語」到沈定年的「述文」、陳以真的「校字」，輾轉幾手，更大幅度逸出原本脈絡。在簡化的譯本中，譯者時而虛構想像，時而渲染情境，使得「實而有徵」的非洲記述反而重蹈沈定年批判的「臆造端倪」，與「敘載實事，羅舉名物，率皆平淡無奇」的風格迭有差異。

針對譯本形式，譯者「就其語擇貫屬者，析為條目，凡六十餘則」，實為六十一則，乃是嚴重減縮的譯本。1857 年出版的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以約三十萬字的長度，記述立溫斯敦橫跨非洲東西兩岸（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創舉：自 1840 年從英國搭船到開普敦（Cape Town），1841 年 7 月抵達已在非洲傳教二十餘年的摩法（Robert Moffat）位於庫魯曼（Kuruman）的傳教站，而後數年又輾轉遷往馬博沙（Mabotsa）、卓奴（Chonuane）、哥羅彭（Kolobeng）等地。1849 年，立溫斯敦穿越喀拉哈里沙漠，發現蓋米湖。1852 年，護送即將返英的妻小到開普敦後，返回內陸途中獲知布爾人（Boers）摧毀部落、燒毀房子，決定往北，更

26 關於晚清文學的「意譯」概況，如 1. 陳平原指出晚清「意譯為主的時代風尚」，大致提出：改用中國人名、地名；改變小說體例，割襲回數；刪去無關緊要的閒文和不合國情的情節；大加增補，譯出原作中沒有的情節和議論；2. 郭延禮提出近代「以意譯和譯述為主要翻譯方式」，「誤譯、刪節、改譯、增添之處時見」。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39-40；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發展脈絡及其主要特點〉，《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26。

進一步探向非洲內陸。1853年5月，抵達利尼揚蒂（Linyanti），又往西北探進，屢遭當地部落敲詐，又逢瘧疾、痢疾、昏睡病之肆虐。1854年5月，終於抵達葡屬地——西岸首都冷羅按大（Loanda）。稍停留後，眾人又東行，沿著尚比西河（Zambesi）下游過程，發現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1856年5月，抵達另一葡屬地奎利馬內（Quelimane）。12月，立溫斯敦從奎利馬內港口登船，首次返回闊別十六年的英國與蘇格蘭（見圖二：非洲行跡路線圖）。

中譯本遠未能反映原著自1840到1856年的路線。明顯可見，譯者不試圖呈現連貫性的時空架構，以跳躍的片段彰顯非洲動植物、風土人物與禮教制度等。六十一則條目如下：

大獅、獸名氏族、養牲妙法、廓老觀獵、卵殼取水、蓋米湖、蓋米眺覽、智井、獸災、獅牛鬪、嗎素鼠蛇、軟木、露坐聽訟、農器、羚羊、游里愛江紀勝、美西紀遇、熱地、凡啵禮樂、遇生的始末、弼倫風俗、賽摩佛、里倍湖、荒場水、海的地氣、鐵網、摩全、昆屯荒象、喪鼓、痴君、莫威、牝牛、開賽重布、敗火鎗、販人陋俗、開撒紀游、黨人違教、要索、虛克江、三昆、毋抱人、開生俗、西洋商、蠻籬、鐵波威、怪醜、三瑞、架屋、按倍加之勝、英船試砲、島城養疴、耕織之利、卡仁風土、半可酋長、盜食奴、葡萄、奴僕賤稱、黑婦妝、海馬掀舟、山巔監獵、野牛。²⁷

上述條目以「大獅」為始、「野牛」為末，實為未完稿，主要譯出立溫斯敦自1840年前往非洲至1854年抵達西岸葡萄牙屬地羅安達的歷程，後面零星翻譯原著往東岸的行程，秩序凌亂，基本上未能反映立溫斯敦自1854至1856年沿尚比西河下游往東岸奎利馬內之內容。

在六十一則的非洲記述外，中譯本「以原圖并屬」，共有二十六幅。原著的正文共附有四十四張圖，譯者擇取二十六張：

壳魯遇獅、火撲獸阱圖、逐獸入坑圖、黑婦用鴛鳥卵殼取水河濱之圖、取水負歸見男子獲獸互相喜幸之圖、蓋米湖携攜眷眺覽圖、湖上所見羚羊、獅搏牛圖、獅牛相鬪圖、露坐聽訟圖、亞洲巴多革黑人農器圖、埃及圖、

27 原文目錄頁沒有列上「蠻籬」條目，可是內文卻有此條目，應是目錄頁之缺漏，此處補上。另，目錄頁的「開撒紀游」與「鐵波威」條目在內文中標為「開撒記游」與「鐵波威」。

羚羊之大如牛者、美西守吏率土人火跳唱相接之狀、牝犀負穉圖、凡皮樂器異式、凡皮武弁帥兵作樂相迎圖、生的所示螺殼三事、南港乘舟圖、鈎住木式、倍新酋長髮罩式、按哥來木兜簪式、幾士河濱負擔式、按哥來架木作屋圖、里按大女人織具式、海馬掀舟。²⁸

不同於文字篇幅的大量簡化，譯本對於圖像選取的比例不低，蓋因圖像更具附會想像的空間。比起「譯語」後再「述文」的多層障礙，圖像更能讓譯者突破文字障礙，看圖說故事，如透過「黑婦用駝鳥卵殼取水河濱之圖」加入婦人「負駝鳥卵殼，徒步數十里，行汲於水」的場景描述；「蓋米湖攜眷眺覽圖」附會「二黑人雙槳盪」、「堤上則一黑人則置鍋爐爲食」的形象勾勒；「南港乘舟圖」虛構「六槳相間，左右並舉，而船首之篙則易而爲槳」的行進原理；「鈎住木式」則是渲染「衣服輒爲所鈎，戳穿而洞」的藤蔓景觀。（〈卵殼取水〉，3b；〈蓋米湖眺覽〉，4a；〈牝牛〉，20b；〈開撒記游〉，25b）

此譯本固然有各種省略缺失，可是恰逢十九世紀中國對於歷史地理學的特定需求而獲得出版傳播的機會。頹衰的時局激發士大夫對於「世界」的關注，相繼介紹世界地理景觀，經度、緯度、五大洲等西方地理學。記述非洲的《黑蠻風土記》也因而受到關注，如 1891 年，憂患時局的王錫祺（1855-1913）以「浸淫輿地之學輯書十餘載」之力，²⁹ 編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叢書共十二帙六十四卷，收中外地理學著作共一千兩百種。其中，《黑蠻風土記》收入叢書第十二帙第九卷，同卷收錄多種非洲著述，如《阿利未加洲各國志》一卷、日本岡本監輔（1839-1904）《亞非理駕諸國記》與《埃及國記》各一卷、《地蘭士華路考》一卷、英國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埃及紀略》一卷、美國丁韞良《新開地中河記》一卷、美國林樂知《阿比西尼亞國述略》、王韜《探地記》一卷。³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向來爲人詬病的是其對於原本的增刪補易、編輯調動等情形，輯入此系列的《黑蠻風土記》出現四大變動：一、去除作者與譯者之名，未注

28 《黑蠻風土記》共收二十六張插圖，往後出版的《泰西風土記》去除其中七張，收十九張圖。另，譯者的圖像說明未必完全符合原著圖片的說明，如「亞洲巴多革黑人農器圖」有誤，原著“A Batoka hoe”欲說明的是非洲 Batoka 部落的鋤頭。

29 清·丁萬寶，〈跋〉，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初編》，頁 10295。

30 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二帙目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頁 9915。

明原書出處；二、取消原書的六十一條目，使得全文變為不分條目的排列；三、刪除十九張圖片；四、刪除沈定年之序文（見圖三）。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上海時務書局以鉛印方式重編印製，標題字樣由清季畫家「梅生王秉槐」題簽。卷首附有沈定年之〈序〉，內文各段落以條目區分，共有六十一則內文與十九張圖，基本上恢復 1879 年申報館版本的面貌。不過，此譯本將書名《黑蠻風土記》改為《泰西風土記》（見圖四），反映其對「黑蠻」字眼所蘊含的偏見有所反思，不過未必精準，觀其內容，實為「阿非利加風土記」。從傳播角度而言，上述幾個版本中，申報版幾乎不見蹤跡，反而是刪節調動而不利於研究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版靠著「叢書」方式得以流傳。

由上可見，《黑蠻風土記》譯本反映豐富的文化訊息，從留美學生計畫的提倡、文人身分的轉變、出版事業的蓬勃到世界歷史地理學的風潮等。奠基於譯本的脈絡背景，本文以下將分成數面向，從譯者的意識形態與詩學結構等面向，逐一探入分析。

三、中國禮教與西方殖民話語的交疊：非洲人體標籤

就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的中譯本題名——「黑蠻風土記」，可預知內文的「異域」轉向，隱藏十九世紀中國人觀看非洲的視角。「翻譯」涉及潛藏於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文化規範、民族心理等元素，遂使來源語進入目的語的翻譯過程，為適應特定社會語境而出現改寫或操縱的情形。³¹ 循此，本節將觀察譯者如何基於各種中西交疊的意識型態而呈現特定的「非洲」形象？

就「翻譯操縱論」或「翻譯改寫論」等論述，得知「意識型態」的差異扞格、折衝碰撞，可促成翻譯實踐的轉向。³² 以此思路觀察《黑蠻風土記》，

31 研究者對「源語」與「譯語（或目的語）」已多有理論思考，如 Toury 指出譯者若亦步亦趨於譯語規範，會做出各種變動，以提高其在譯語文化的接受度；Gentzler 分析 Toury 的翻譯理論架構時指出「目的語文化整體接受性」所構成的理論假說與「譯本對應於源文本的完整契合度」所構成的功能動態對應。見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 56;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28.

32 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提出「翻譯是對原文的一種改寫」（theory of rewriting）：「『改

可以揣測，譯者異於立溫斯敦的位置，必然某種程度調動源語文本的方向。從 1840 到 1856 年，立溫斯敦以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教士身分探入非洲，即或其傳教動機因探勘活動而屢遭教界質疑，他卻在傳記中信誓旦旦地陳述自己的傳教意圖。為克服傳教不力的指責，他以相當篇幅訴及唯一受洗成功的教徒——貝文（Bakwain）部落酋長西霽（Sechele）面臨的困境，³³ 反映非洲居民改變信仰的艱辛，不無自我辯護之意涵。相形之下，譯者不具有傳主的焦慮，一再淡化立溫斯敦有意標舉的教士身分與傳教意圖，將西霽置入中國文人更關注的家世淵源、交遊模式等脈絡：「暇則詢其家世，知其太祖慕初居此地，能周歷山水，曉識人物風俗」、「氣宇不凡，姿容美好，尤善待人，與余極親信。」（〈獸名氏族〉，2a、2b）完全不提西霽的受洗與困境。譯著書名去除「Missionary」，以刪刈遮掩或收斂隱晦的方式處理原著涉及宗教色彩的文句段落，如譯及三毘（Cypriano）供奉聖安東尼之蠟像時，跳過聖安東尼照顧迷路羔羊之典故，將之變為博學多聞的古人：「西洋之古人，聲施後世，為人欽慕」、「能通天地格致之學，可傳於世」；（〈三毘〉，32b）³⁴ 又如「山巔監獵」一節，立溫斯敦之從人捕象時以「上帝的旨

寫』是一種人為操控的行爲，雖然向權力核心靠攏，但從正面的角度來說，同時也可能是社會及文學演進的催化劑。『改寫』能夠引進嶄新的觀念、文體和文學形式，可以說翻譯的進程等同於文學的革新發展，並反映出文化之間如何相互形塑。相反的，『改寫』也可能控制、扭曲或遏止革新。在這樣一個各個面向都受到越來越多人為因素干預的時代，透過研究文學中以『翻譯』形式反映出來的『改寫』之進程，我們得以提身自身對當代真實社會的認知。」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VII. 勒菲弗爾在該專著中主要探及「翻譯」如何受到意識形態（ideology）、詩學形態（poetology）、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的制約／開拓，改寫者對原著進行調整，以使其符合改寫者所處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進而達到被接受的目的。

33 原著第一章用諸多篇幅描寫西霽如何勤奮學習語言、受洗成教徒、試圖改變村人，可是卻又因當地風俗而遭遇各種困境，如因擁有多位妻妾而無法徹底實踐宗教道義的掙扎。相關記述可見第一章的小標題：Sechele's Questions - He Learns to Read - Novel mode for Converting his Tribe - Surprise at their Indifference - Polygamy - Baptism of Sechele - Opposition of the Natives（西霽的疑問—他的學習之路—革新部落風俗之道—意料之外的冷漠態度—一夫多妻制—西霽的受洗—當地住民中的反對聲浪）。

34 原文可見：They had also a few tracts containing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and Cypriano had three small wax images of saints in his rooms. One of these was St. Anthony, who, had he endured the privations he did in his cell in looking after these lost sheep, would have lived to

意」(「The gods have said it」), 自我合理化捕象的行徑。可是, 譯者將「上帝旨意」變為「象乎象乎! 爾命合盡於今日乎? 吾已衆擒爾, 爾將焉逃」, (〈山巔監獵〉, 52b) 象隻被捕乃是命運所然, 而非「上帝的旨意」, 淡化原著的宗教色彩。

宗教並非沈定年的訴求, 反而以興騰於晚清知識圈的「新世界觀」作為應對的方式, 如譯者對原著卷首〈導言〉的翻譯模式乃是一例。立溫斯敦原是敘述其祖父遷移蘇格蘭、父親對教會的熱衷, 到自己在紡織廠工作進修、嗜好科學自然與旅行讀物的童少年歷程, 接而開啓長達十六年(1840-1856)的非洲傳教記。³⁵ 此導言原可吻合中國追溯家門的傳統, 不過極可能因宗教色彩過於濃厚而遭刪除, 改而杜撰中國知識分子更為關注的新世界觀:

余早歲輒好遊歷, 思欲窮地球五洲之勝, 而力每不逮。囊歲乃遊於阿非利加洲之境。洲據地球東半, 在歐羅巴東南, 而亞細亞之西南。廣袤里數, 經緯線度, 志海國者動詳言之, 不復贅詞。其地人物, 大畧樸實少文, 蓋靈秀之鍾毓, 至此殆將窮絕, 故遠不及諸洲。而其在四大洲中, 山川形勢亦不少遜, 且拓地廣長皆在萬五六千里有奇則, 其中人民之繁富、都會之盛大、物類之離奇、古蹟之留遺、舟車所至, 不勝罄紀。(1a)

譯者杜撰立溫斯敦「早歲輒好游歷, 思欲窮地球五洲之勝」之願望, 長篇闊論各大洲歷史地理學, 將立溫斯敦以宗教為立基點的「訴說從頭」, 置入彼時中國「開眼看世界」的風潮, 反映時人對新世界觀的浮想聯翩。³⁶

better purpose, 涉及到宗教脈絡中的安東尼照顧迷路的羔羊的典故。David Livingstone, "Books and Image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95.

35 David Livingstone, "Introductio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1-8.

36 關於晚清的新世界觀已非傳統的「天下觀」所能概括, 相關研究可見金觀濤、劉青峰, 〈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 《觀念史研究: 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頁 40-53; 羅志田, 〈天下與世界: 清末人士關於人類社會認知的轉變——側重梁啟超的觀念〉, 收入《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頁 30-54; 章清, 〈晚清「天下萬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及其意義〉, 《二十一世紀》94(2006.4): 54-62; 顏健富, 〈廣覽地球, 發現中國——從「文學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1(2012.9): 1-44, 考察「萬國」、「民族」、「天下」、「國家」、「世界」等關鍵詞的使用、傳播及其意義。

耐人尋味的是：譯者的「新世界觀」並非一能與傳統「天下」、「華夏」意識截然切割的價值意識，反而層層牽扯糾葛。就題名「黑蠻風土記」之「黑蠻」，明顯可見不同於原著‘South Africa’的中性之名，反映一具有位階差異的凝視，隱然回應傳統士大夫將「異域」變為「鬼怪盛行、凶險可怕」的視野。³⁷ 譯者透過各種方式誇大「髮拳縮連、鬢夾頤，滋其黑醜」的非洲臉譜，（〈莫威〉，19b）又擷取附於原著的圖像，名為「倍新酋長髮罩式」（見圖五），逕自看圖說故事：

其裝束亦頗奇異，最異者捲髮成髻，而用樹葉編成髻，罩式三角，平罩於枕角之後，而以繩洞穿其髻，使相聯屬，髻塞於中外平橫尖物，狀殊惡。罩上以五色漆之，青紅黃黑皆直析，相間成文，其外圍圓約六寸餘，自受髻處至尖頂凡八寸，怪異之形，惟首長有是飾，而其下皆無之。科頭拳髮，蓬然如亂草而已，其鬚則挑出四旁，擇最中百十莖以蠟澆之，使堅硬挺直，再以餘莖，捲粘於蠟上，黝然一挺柱，無美髯態度，而土人反以為貴者相。（〈虛克江〉，31a）

核對原文，即可見譯者不同於立溫斯敦對倍新酋長髮罩的客觀描述，³⁸ 加入「頗奇異」、「最異者」、「無美髯態度」等主觀評論，接而又導向禮教訓誨：「嗚呼！禮文未具，無古制、無時妝束，動以意為之，多見其怪也。然鬚與髮如是飾觀，而被體之物反畧，無制度，蔽以絨毯，猶為歐洲產，而由西洋商携之以入者也，其下則竟裸耳。」（〈虛克江〉，31a-31b）深化愚昧、落後、神秘的印象，彰顯未經禮教薰陶的非洲人體標籤。

沈定年即或具有較開闊的新世界觀，可是與文化傳統的鏈結並非一刀兩斷，一再將非洲陋習簡單地歸咎於禮教缺失：「上之政教，下之性情，皆無足觀。又無聖人者興於洲中，以自為徒，任其野俗暴戾，村陋少文，不得列於上國，良可惜也。」（〈敗火鎗〉，23b）且彰顯「聖人」教化的重要性：「然

37 沈慶利，〈現代中國異域小說之界定及發生發展概況〉，《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9。

38 David Livingstone, “Chief’s mode of dressing his Hair”,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93. 原文如下：‘he was a young man, with his woolly hair elaborated dressed: that behind was made up into a cone, about eight inches in diameter at the base, carefully swathed round with red and black thread.’（他是個精心裝扮髮型的年輕人，把捲曲的頭髮從後腦杓處紮起成一束圓錐狀的馬尾，髮根處直徑約八吋長，並用紅色與黑色的線綁住。）

余一以忠信待之，使彼稍遂其欲，而仍不敢甚肆其欺。嗚呼！雖狃獠之俗，亦安有不可化哉？而惜乎無人以治之也。」（〈虛克江〉，29a）在禮教傳統的基調上，譯本將立溫斯敦的「教士」身分一變而為自身文化脈絡的「聖人」形象，凸顯立溫斯敦教化非洲的重要性。譯文第三十七則「黨人違教」即可見譯者以自身的禮教傳統強勢介入原著，強調「排土」（Batoka）與「按僕」（Ambonda）族喧嘩爭鬥、以亂犯上，³⁹將茶壺風波渲染成外來者與在地者的衝突，讓立溫斯敦曉以大義：「汝等既為我用，寧不知禮而狂悖嚷鬧」、「我今用汝輩，即汝輩之主人，安有不聽主人之理？」「余曰：爾今衣何人之衣？食何人粟？徒不思本而與我強爭主客乎？」（〈黨人違教〉，27a）譯本以自身的禮教傳統渲染「不知禮而狂悖嚷鬧」的人體標籤，實有違於立溫斯敦對待非洲的自覺意識：

In our relations with this people we were simply strangers exercising no authority or control whatever. Our influence depended entirely on persuasion; and having taught them by kind conversation as well as by public instruction, I expected them to do what their own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dictated. We never wished them to do right merely because it would be pleasing to us, nor thought ourselves to blame when they did wrong.⁴⁰

（對於當地人來說，我們只是無關的陌生人，他們沒有義務配合我們或為我們而改變。我們依靠柔性勸說及公開講道的方式散布我們的教義，並強烈希望他們是藉由自己心中建立的善惡標準去行事，而非因為討好我們或懼怕我們而言不由衷。）

更複雜的是：譯著呈現的人體標籤無法簡單視為傳統「華夏」心理的折射而已，卻又滲入西方的殖民論述，相互糾纏，暗渡陳倉。鴉片戰爭以降的各種失利牽動晚清中國的取向危機（orientation crisis），⁴¹西方以國勢「強弱」

39 David Livingstone, "Insubordination Suppresse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75.

40 David Livingstone,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21.

41 張灝指出：「政治危機」乃是自殷周以來就作為政治秩序的宇宙王制（cosmological kingship）的解體；「取向危機」則是因傳統價值取向、文化認同、精神意義三大方面的瓦解。見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14.2(2003.6): 4。

為依據的論述滲入晚清文化界，⁴² 使得原本受到質疑的華夏中心論轉向「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二元架構。當譯者在「世界五大洲」架構上滲入「黑蠻」、「科頭拳髮，蓬然如亂草」、「其下則竟裸」等看似華夏視域的非洲人體標籤時，實也融入殖民話語下的「強弱」標竿，遂使譯本中的「天朝上國」、「天下共主」等指向現實中以國力軍事佔優勢的西方列強。譯者沿著如此基準，裁剪受「黑蠻」簇擁的傳主形象，如譯文第五則〈卵殼取水〉敘非洲人「里祖聞余名，竊心慕之，以為上國衣冠，忽焉泣止，私以得見顏色為幸，乃命僕人以車來迎。自廓老登程，不數晝夜，已至比邱乎之地。」（〈卵殼取水〉，3a-3b）事實上，探勘費由商人兼探險家奧斯維爾（William Cotton Oswell）贊助，⁴³ 非因里祖「以為上國衣冠，忽焉泣止」而「命僕人以車來迎」；第十八則〈美西紀遇〉（town of Ma-Sekeletu）描述「土人見余，知必由某大國來，相迎道左，即敬謹循禮。」（〈美西紀遇〉，9a）但立溫斯敦並非因「大國」身分而受款遇，而是因抵達友人西哥里都（Sekeletu）之領土所致；⁴⁴ 第二十四則〈里倍湖〉寫立溫斯敦獲當地婦人贈送之雞遭竊，竊盜被「執送諸官」，「土人之媚余也，亦可謂無遺力矣。」（〈里倍湖〉，14b-15a）實際上，原文無「執送諸官」、「土人之媚余也」等描述，卻是由婦人直接出面指認竊盜。⁴⁵

從「上國衣冠」、「大國」、「媚余」等譯著衍生的譯詞，都出現一核心結構：當地人如眾星拱月般圍繞立溫斯敦，使得傳主形象潛藏著「天朝上國」的思維。不過，隨著現實情勢與強弱關係的變化，當譯者將傳主與非洲人的關係置入正受挑戰的「天朝」架構時，「天朝」主人已非華夏，而是以軍事稱

42 劉禾曾指出：為合理化殖民擴張的行徑，西方列強將種族和民族國家的範疇作為理解人類差異的準則，假藉種族進化之名，從人種優劣發動殖民活動，豎立歐洲的種族和文化優勢，為西方征服東方提供「進化論」的理論依據。劉禾，〈國民性理論質疑〉，《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評綱要》（上海：三聯書店，1999），頁68。

43 David Livingstone, "Departure from Kolobeng,"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61. 奧斯維爾與立溫斯敦、穆雷（Mungo Murray）於1849年6月1日自廓老（Kolobeng）出發，穿越喀拉哈里沙漠，經歷磨難考驗，始抵達里祖（Lechulatebe）處。

44 David Livingstone, "Town of Ma-Sekeletu,"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244-245. 核對原著，始知譯文「美西」乃是 town of Ma-Sekeletu 之音譯，意指 mother of Sekeletu，乃是西哥里都的管轄之地。

45 David Livingstone, "Theft,"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331-332.

霸的列強。在位階差序下，譯者為美化傳主，不惜篡改原著。譯文〈莫威〉原是記述抵達莫威村的立溫斯敦感激居民殷勤招待，贈送薙刀一具、氈毯一床，卻因贈品過於卑微而愧疚不已，⁴⁶ 譯者卻隱藏傳主的愧疚，反而將贈品導入振振有詞的教化論：「薙刀蓋導以整容之法，勿令髮拳縮連鬢夾頤，滋其黑醜也。而氈毯則示以製造之巧，或其後有所仿織，而漸以興利乎」；（〈莫威〉，19b）當立溫斯敦進入煦部洲（Chihune）時多次被河熱病（river fever）襲擊，發燒暈眩，無法記錄行程里數，⁴⁷ 譯者卻虛構「居民樸陋無文，亦事事簡畧，里數丈尺，輒不能知。遊人過境即忘，亦無暇詳求。故自某處至某處，里數不能記」。（〈販人陋俗〉，24a）任何可能損毀或模糊立溫斯敦形象的事蹟或遭遇，在譯文中均受到相當程度的調整。

譯本潛藏著由禮教制度與殖民話語所形構的位階差序，因而，當譯及立溫斯敦慘遭敲詐勒索的慘況時，譯者以遠超出原著的批判語調，譴責汽婆黨（Chiboque）的行徑。從譯本第三十四至三十八則的〈敗火鎗〉、〈販人陋俗〉、〈開撒紀游〉、〈黨人違教〉、〈要索〉，隨處可見高亢激烈的批判聲調，甚至顛倒衝突場合：汽婆黨持著火鎗「圍余於行帳中」，「有執火鎗者五人當前道，若有衝鋒陷陣之勇」。核對原著，恰好相反，汽婆黨實無持火鎗，因推測立溫斯敦等人只有五把火鎗，不足為懼，威脅敲詐。⁴⁸ 譯者將汽婆黨變為持火鎗者後，杜撰其購買火鎗與靠火鎗而「雄視鄉井」的背景，又在駁戰中因「不知用處，亂擊橫施，甚至倒炸，不傷余黨而自斃」，塑造汽婆黨作為侵略者的暴力形象與「火攻之利，茫然不知宜，其自取殘傷也」的愚昧行徑。（〈敗火鎗〉，22a）若就原著脈絡，立溫斯敦固然厭倦於汽婆黨三番兩次的敲詐，可是重點在於反思外來販奴商養成當地人賄賂、敲詐等行徑的根本之因，如：

46 David Livingstone, "Interview with Katema,"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44. 譯者譯為「莫威」，不妥，蓋因莫威（Moene）乃是對酋長 Katema 的尊稱，實指「主」（lord）之意，應譯成「開的瑪」。另，譯文中的「氈毯」實為「披肩」（shawl）。

47 David Livingstone, "Fever,"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371-372.

48 David Livingstone, "Our Encampment Surrounde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68.

They had been accustomed to get a slave or two from every slave-trader who passed them, and now that we disputed the right, they viewed the infringement on what they considered lawfully due with most virtuous indignation.

(他們從販奴商那裏隨意購買奴隸是司空見慣的事，而今，我們對這種風俗提出質疑，他們卻道貌岸然地將反對的聲音視為對其應得正當權益的控訴。)

The reason why the people have imbibed the idea so strongly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demand payment for leave to pass through the country is probably this. They have seen no traders except those either engaged in purchasing slaves, or who have slaves in their employment. These slave-traders have always been very much at the mercy of the chiefs through whose country they have passed.⁴⁹

(這也許就是他們如此理直氣壯地認為有權利向我們索賄的理由。除了從事人口販賣生意的商人和擁有黑奴的雇主，他們沒有見過其他形式的外來客。而人口販子通常都深諳「賄賂買賣路線途經的當地部落」之道。)

譯著抽離原著的深層反思，反而以渲染虛構的手法，黏貼一則則貪鄙愚昧的人體標籤：「性情猥鄙」、「不良且不類」、「舉止貪鄙猥褻極矣，猶於人前假禮貌之迹，申往來之誼，謂可以脫騙，上國之人多見其不知量也」、「無勇而又無謀，齷齪委瑣，徒為他國憎厭，與人則重利寡義，兼乏禮容，顛倒反覆，小人之行徑也」、「其人貌獐惡，獐頭鼠目」、「賤而醜」、「〈敗火鎗〉，21b、23b、24a」「鬼蜮伎倆」、「黑膚膩皮，塗泥燥裂，余諦視之，狀如鬼怪」、「素行未改，反覆無常，鄙陋之習，終被耻笑也」。(〈要素〉，28a、28b)

譯者逸出原文脈絡，以固定的視角將非洲人體置入套話 (stereotype) 結構，⁵⁰ 放大賤醜獐惡、獐頭鼠目、貪鄙猥褻的形象，強化既定的愚昧、落後、神秘的標籤。此人體標籤不僅呼應中國對於域外的鬼魅化伎倆，也展現十八世紀下半葉歐人為合理化販奴行徑，藉由科學塑造「黑人低人一等」的神話：「證明由於他們是劣等種族，所以命定要做優等種族的歐洲人的奴

49 David Livingstone, "Way in which it was averted," "Continued Demand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71, 379.

50 套話是對一種文化的概括，它是這種文化標誌的縮影（如陳腔濫調），是在一個社會和一個被簡化了的文化表述之間建立起一致性關係的東西。參見（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 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形象〉，收入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60。

隸」。⁵¹ 在「優勝劣敗」的「進化」視野下，譯者撇開立溫斯敦不談「殖民」的原意，反倒是指出其器技不良、行師輕敵、無勇無謀、重利寡義等，「苟以君命率師入洲中畧地」，「再以恩義結其人心，以禮法化其風俗」，「得其地而治之，又奚難焉？」（〈敗火鎗〉，23b）由此可見，譯者將立溫斯敦的非洲記述放入由殖民話語與禮教傳統交疊的位置。

弔詭的是：當譯者將「中國」抽離「天朝上國」的位置，根深蒂固的「天朝」心理卻非直接裂變，又如幽魂般徘徊於譯文的字裡行間，形成糾葛曖昧的狀態。譯著多處閃爍著中國器物的光輝，如〈蓋米湖〉以「先王之器」凸顯非洲捕魚法的落後；⁵² 〈農器〉以古中國的農具解釋非洲部落居民的「農器」，有違於原著的古埃及農具的說明，將原著隨文附上的古埃及農具圖像，⁵³ 強勢變為「古中國」農器：「余所見洲中有水之地甚少，故種植之利，不及他國，蓋屛水甚勞也。黑人亦知製農器，大抵似中國鄉村所常用者，舂米簸糠皆得便益，惟形式笨重而已」；（〈農器〉，7a）〈蠻籬〉描寫非洲轎子「tipoia hammock」，原文只提及轎子的外型與乘坐方式，著墨不多，⁵⁴ 譯者就原著附上的圖像——「按哥來木兜籬式」（見圖六），虛構各種原理，進而追溯到中國器物：「籬異常式，聞中國山鄉有此，雖崎嶇之境，坐者擡者皆安

51 S. U. Abramova, "Ideological, doctrinal,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1979), p. 25. 其中, "Beginning of racism" 一節 (pp. 23-25) 論及荷蘭醫生坎柏 (P. Camper) 透過人類與猿面部骨骼比較測量的方式判定非洲人面部接近猿而不接近歐洲人。其追隨者懷特 (C. White) 則利用不同人種的骨骼與猿類骨骼的區別, 稱歐洲人在體質與智力上都優於非洲人。

52 原著只以一句說明: 'They also spear the fish with javelins having a light handle, which readily floats on the surface' 不帶負面語氣, 可是譯文卻指出: 「湖之中亦間有取魚以為食者, 然先王網罟之制未傳於其人, 又其性率愚, 無靈心智慧, 以為諸器大都以鎗刺水中, 技熟者破魚腹, 隨鎗尖以上, 亦不投餌釣之物, 鎗之制, 蓋以鐵鍼入木柄而已, 其羸陋類如此」, 實不符原著的介紹語氣。David Livingstone, "Fish in the Zouga,"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86.

53 David Livingstone, "Egyptian Pestle and Mortar, Sieves and Kilt,"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213. 文中使用 Sir G. Wilkinson 名為「古埃及人」(Ancient Egyptians) 的圖像 (是一組農具操作的示範圖), 說明非洲 Makololo 與 Makalaka 族的農具特點。

54 David Livingstone, "Soldier-guid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405.

適」、「昔中國夏禹治水有所謂四載者，此即其一，不知其製何時入洲中？第余所乘，易竹筐爲木兜，又若中國所用以送禮之格箱，去其上數層，而存其底者。」（〈蠻簫〉，37b）譯者在各細縫之處嵌入原著所無的「中國」視角，替非洲文物勾勒「中國源頭」論，使得其原有意破解的「天下觀」、「華夏」等意識，卻又在翻譯實踐中絲縷糾結，潛藏著優越的民族心理。

就上而論，當譯者按照源語文化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非洲人體標籤時，不僅牽動自身的文化傳統，亦面臨近代西方列強持著軍事優勢而自我合理化的殖民論述，嵌入彼時交鋒／交融的殖民論述與禮教傳統，產生複雜的組合效應，隱藏著十九世紀中國人觀看非洲的視角與殖民話語所形構的位階差序，加遽愚昧、落後、神秘的非洲「人體標籤」，呼應譯著題名有意爲之的「黑蠻」形象。

四、「研究」與「傳教旅行」的選擇：文人化的非洲視野

就立溫斯敦的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而言，可見到作者有意彰顯「傳教旅行」（Missionary Travels）與「研究」（Researches）兩大框架。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因其自身的文學傳統、詩學視角等因素而重組「傳教」、「旅行」與「研究」之框架，導入中國文人的核心命題。本節將剖釋考辨箇中的翻譯轉向。

關於「傳教」、「旅行」與「研究」，在立溫斯敦的生命歷程中並非不辯自明的協調體，卻是經由長時間的困惑、掙扎與辯證而逐漸取得平衡。原著〈導言〉尤能彰顯傳主面臨宗教、科學與旅行的內在衝突，因嗜好科學、自然、旅行等被視爲與宗教對立的讀物，陷入情感嗜好與宗教信仰的價值分裂，進而引發深沈的愧疚感。⁵⁵ 往後他到非洲傳教時一再冒險探勘，屢受教會人士的質疑。1857年，當立溫斯敦以「傳教旅行」與「研究」概括自己的經歷時，可視爲個人價值的宣示，以「傳教旅行」強勢回應教界的質疑：「旅行」乃是爲「宣教」，爲探索福音據點而不斷探入非洲內陸，沿途稱頌基督上帝，表達矢志不渝的傳教精神。

55 David Livingstone, "Introductio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1-8.

顯然，譯本忽略立溫斯敦的夫子自道，撕裂「傳教旅行」與「研究」的深沈聯繫，逕自迎拒取捨，遂使原著的價值選擇變調為中國譯者的核心命題。立溫斯敦帶著測量器物探入非洲內陸，記載、勾勒、描述非洲植物、經緯度、地理形勢、動植物、病理學等，夾敘夾議，探討非洲內陸的困境與尋找出路的可能，研究意味甚為濃厚。可是，對於中西學術初步接觸的晚清文化圈而言，譯者未能充分理解「研究」所含有的理性精神，對於「旅行」的興趣更甚於「傳教」與「研究」。譯者刪掉不合於自身禮教傳統的宗教片段外，亦淡化「研究」面向，摒除原著珍貴的非洲地圖與路線圖、經緯度數據與各地植物資料等。

當「傳教」與「研究」視野受到壓抑時，「旅行」更能切中深受遊記傳統浸潤的中國文人。不過，譯者對於「旅行」的接受亦有自身的視角，更偏向中國文人式的「遊興」感懷。以文中段落與段落的銜接方式為例，即能見到原著與譯著的差別。就原著而言，立溫斯敦每至一處，或標誌日期，或勾勒經緯度、地形、河道、山谷等，構成一以地理學為主軸的非洲旅行結構。可是，譯者取消客觀數據或記載，在片段與片段之間嵌入「遊興」感懷：「其地其枯燥亦復類是，由是以往所過，無足玩覽，不復流連，迫直驅車而過之」、（〈智井〉，5a）「已而養疴，既癒心痛，經此巨創，足跡可止，然游興終不能遏也」、（〈廓老觀獵〉，3a）「余於此處小住，頗愜游志，尋至海汊處，將窮極其境，徧歷洲中，以攬其勝」、（〈游里愛江紀勝〉，7b）「既而又涉水程欲至姆哥回左近處，以資游覽」、（〈凡岐禮樂〉，10a）「余日與生的聚語，不忍遽別，惜無遊處，將舍陸登舟，以遊於他處」、（〈弼倫風俗〉，12b）「去魯克河十有五里，有村曰蘇愛河濱，人道其勝，給余往游」、（〈摩全〉，16b）「停趾數日，樂而忘倦，從人不解事者，屢促余行，余意良不忍舍去也」、（〈開賽重布〉，21b）「居行帳一日，無甚游眺處，幸與三毘等敘語」。〈姆抱人〉，33a）此以「遊興」為敘述推動力的方式，或是凸顯傳主方興未艾的遊興，或是敘述遊興已盡而改往他方，反映中國文人的審美旨趣。

在遊興旨趣下，各片段的起迄之處大多以文人情感為指南針，缺乏具體的路線聯繫，⁵⁶ 遂使前後連貫的地理學路線變為起承轉合的情感度數，實難

56 原著清楚反映立溫斯敦 1841 年抵達庫魯曼傳教站，1843 年往東北兩百英里的瑪保薩建

勾勒立溫斯敦自 1840 年抵達南非乃至 1856 年探入東西兩岸的進程。譯文的時空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出現謬誤，如第四十九則〈英船試砲〉徹底迷失方向：「復止一處，與前火撲觀獸阱處不遠。蓋游蹤無定，出向東行，折而西，則又至故處也，于是又入壳羅之境矣。壳羅地本濱海，各國帆檣所聚，余至之日，有別定非爾船二艘，一曰博魯大，一曰非羅密。」（〈英船試砲〉，40b）事實上，立溫斯敦並非返回「故處」壳羅（Cape Colony），卻是進入西岸葡屬西非首都冷羅按大，見到兩艘分別名為 Pluto（「博魯大」）與 Philomel（「非羅密」）的船艦。⁵⁷「別定非爾」亦是誤譯，並非船名，而是邀請眾人參觀船艦的指揮官 Bedingfeld 之名。「壳羅」與「羅安達」固然都屬「濱海」，卻天差地別！立溫斯敦的「探地」意蘊即在於擺脫彼時西方人聚集的南岸「壳羅」，穿越沙漠、叢林、疾病、擄人族等層層障礙，抵達西岸「羅安達」，如此的「探地」意義顯然不為譯者所掌控！

可進而思索的是：對於「研究」、「傳教」與「旅行」架構的壓抑或凸顯，主要是來自「譯語者」或「述文者」？沈定年的述文乃是奠基於史錦鏞的譯語版，而史錦鏞是否能充分理解或忠實轉述原著內容？就目前有限的資料，雖無法考據，卻可推敲一二。以史錦鏞對基督教與西學的接受度與不擅長中學等特質，⁵⁸不太可能讓譯本從「研究」、「傳教旅行」變為高度文人化的「遊記」。沈定年具有中國傳統文人的美學旨趣，博通經史、長於詩文，如其 1876 年主編《侯鯖新錄》，體制形式如同《申報》系列的《瀛寰瑣記》、《四溟瑣記》、《寰宇瑣記》等，主要刊登文人詩詞、文史、戲曲等，偏向傳統文人的美學。雖然，沈定年強調「或隨其語音繙為華字，不能索解，兼乏考

立新傳教站，1845 年帶著妻兒搬到內陸四十英里的卓奴，結識當地酋長西魯，又因水源問題而遷至更北的哥羅彭。1849 年，穿越喀拉哈里沙漠，在庫汝曼北方八百七十英里發現蓋米湖。1852 年，由於擔心妻兒安全，送他們到開普敦搭船返回英國。1853 年，立溫斯敦帶著土著深入西北探險，沿途碰到敲詐勒索、瘧疾痢疾等威脅，1854 年 5 月抵達羅安達。可是，譯著卻抽離原著的時間架構。

57 David Livingstone, "They Visit Ships of War,"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423.

58 就留美學生檔案可見，其受遣返的原因之一是對西學的接受，甚至留有稱頌「基督」的筆跡。史錦鏞對於西學的接受，對於十九世紀出使或留學西方的中國人仍是一禁忌，如駐外大臣郭嵩燾便因對西學的讚賞而備受批判。

據之功，則皆仍立溫斯敦之原文，而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序)，2a) 可是，就譯本呈現而言，翻譯原則與實踐結果顯然背道而馳，變為反諷性的「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偏向於中國詩學的遊記感懷。

根據翻譯研究，「詩學」(poetology) 乃是重要的視角，受到早於源語文化即存在的文學觀念、文學範式、創作手法、審美慣性的影響。詩學視角彰顯譯者如何在其所處的文化體系中使其譯文符合其所處時期的詩學型態，以達到原著被接受的目的。⁵⁹ 當沈定年替「平淡無奇」的原著注入中國詩學時，必然逸出原著的風格。原著更偏向於簡潔記述，較少雕琢詞藻或鋪排意象，如立溫斯敦強調自己「不具文學造詣」(No Claim to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之因故：自幼因當棉花紡織工人而未曾接受正規教育，往後探入非洲時的忙碌生活又讓他無暇進修，「與其要我再寫一本書，我想我寧可再進行一次穿越非洲大陸的任務。書寫旅行比旅行本身要來的困難許多。」⁶⁰ 從不具文學造詣的作者到長於詩文的譯述者，牽動譯本的轉向，變為中國文人化的非洲景觀。

在任意、斷裂與跳躍性的非洲路線上，處處浮現中國詩學，如譯文第六則〈蓋米湖〉的「逍遙」意境。事實上，立溫斯敦瀏覽蓋米湖時，對河道有諸多反思，冀望開拓一條通往非洲內陸的河道，透過常規性的商業往來，終止扭曲人道的擄人販賣之行徑。⁶¹ 譯者撇開原著的核心關注，以原著隨文附上的「蓋米湖」圖片(見圖六)，逕自看圖說故事。在詩學規範的轉換下，譯文凸顯圖像中的黑人雙槳搖蕩、置鍋鏟為食的「意忻忻自得」之情境，將「蓋米湖」描述為逍遙自在的空間場景：「蓋米湖之涯，望其水清冽，並滿欲溢，卸車以行，自隄上觀之，豁目醒心，為月餘枯坐旅館無所見聞以來第一快事」；((蓋米湖)，4a) 又如第十六則〈游里愛江紀勝〉，譯者以典雅的文字將原著中難於跨越的壯觀瀑布——里愛江(Leeambye)，變為「好景泥人」的中國山水畫：「夾岸山色，下映水光，佳木蔥蘢，油然青碧，天成圖畫，飽看

59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p. 26.

60 David Livingstone, "No Claim to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8. 原文如下：'I think I would rather cross the African continent again than undertake to write another book. It is far easier to travel than to write about it.'

61 David Livingstone, "Discovery of Lake Ngami,"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76, 79.

不倦，亦不覺泛宅浮家之苦，舟又極穩，好景泥人。」譯者又虛構眾人游江途中登島探勘，⁶² 見到「內洞天也，四圍山色，雜以樹陰，濃淺相間，致足娛目。樹多棗，果實芬芳之際，可待仙人之黃精，惜非其時，不得採食」，（〈游里愛江紀勝〉，8a）儼然呼應「洞天福地」的文學傳統，反映中國詩學對於異域的制約／形塑。

在詩學視角下，原著樸實無華的議論陳述變為詩文創作，甚至將非洲沙漠轉為春意盎然的詩詞場景。第十二則〈軟木〉，乃是記錄立溫斯敦前往樹迦（Zouga）時看到拿可達薩（Nchokotsa）鹽地折射的海市蜃樓（mirage）場景：

At Nchokotsa we came upon the first of a great number of salt-pans, covered with an efflorescence of lime, probably the nitrate. A thick belt of mopane-trees (a 'Bauhinia') hides this salt-pan, which is twenty miles in circumference, entirely from the view of a person coming from the southeast; and, at the time the pan burst upon our view, the setting sun was casting a beautiful blue haze over the white incrustations, making the whole look exactly like a lake . . . The mirage on these salinas was marvelous. It is never, I believe, seen in perfection, except over such saline incrustations. Here not a particle of imagination was necessary for realizing the exact picture of large collections of water; the waves danced along above, and the shadows of the trees were vividly reflected beneath the surface in such an admirable manner, that the loose cattle, whose thirst had not been slaked sufficiently by the very brackish water of Nchokotsa, with the horses, dogs, and even the Hottentots ran off toward the deceitful pools. A herd of zebras in the mirage looked so exactly like elephants that Oswell began to saddle a horse in order to hunt them.⁶³

（一進入拿可達薩，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就是數量驚人的鹽丘，表面覆蓋著類似硝酸鹽的風化石灰。一整片茂密的可樂豆樹圍繞著鹽丘，從東南方目眺，可目測密林總周長足有二十哩。落日餘暉照射在眼前一望無際的鹽田，在其潔白的表層泛著藍色薄霧，恰使鹽田看起來像一座湖……鹽礦上

62 David Livingstone, "Beautiful Island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232.

63 David Livingstone, "The Mirag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72-73.

的海市蜃樓幻美絕倫，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光投射在鹽層上，不可能有如此的美景。無須憑藉任何想像力，任誰都會把眼前的風光解讀成一座巨大的水凼：波光瀲灩，樹影在水面上如此逼真地款款搖擺，挑逗那些受夠了拿可達薩鹹水的散漫小牛、馬群和犬隻，甚至某些何騰托人，為了解渴前仆後繼衝向這座並不存在的湖。連奧斯維爾都上好馬鞍，準備狩獵海市蜃樓中映出的一群斑馬幻影。)

原著寫出非洲鹽地折射的海市蜃樓場景以及眾人的視覺謬誤，顯得逼真動人，乃是全書少見的能夠反映寫景功力的片段。譯者卻徹底撇開「海市蜃樓」的場景，變為詩詞化的「春日融融圖」：「路之旁有田，時有飛蟲集田中樹，以食其葉，簌簌有聲，春蠶食桑狀。是時天氣朗靜，春日融融，百草發榮，具有生意，稍覺爽心悅目焉。」(〈軟木〉，6b) 為滿足中國文人對於「春日融融，百草發榮」的殷切期待，譯者在酷熱的沙漠鹽地培植「爽心悅目」的「春日融融圖」，或許詩情畫意，不過也顯得矯情造作。

中國詩學結構牽動著譯本的轉向，更牽引出中國文人「逞才肆情」的文化慣性，甚至為渲染文人情懷而嚴重違反原著內涵。譯著第三十九則〈虛克江〉尤為明顯，以具有韻律節奏、意象美感的文句，對滔滔虛克江衍生中國式的良辰美景，虛構立溫斯敦與導遊倫開派受之子 (Ionga Paza' son) 的對話：

子游樂乎？余漫遊海外，如此江之不舍晝夜，幾無歸宿處，幸子相從，與余同好，良辰美景不可失也。暇當與子痛飲沈醉，消腔中豪邁鬱勃之氣，政(放)歌震天地，拔筆留題傳，一時佳話。百年之後，文物益盛，俾此邦之人，永知今日，有余二人偕游之蹟可乎？(〈虛克江〉，頁 30a)

實際經歷裡，立溫斯敦委請倫開派受之子當導遊，但對方取得酬勞後趁機離去，遂使立溫斯敦發出批判之語。⁶⁴ 就譯著塑造人體標籤的策略而言，此實可讓譯者渲染的片段反而出現美化筆調，反映文人逞才肆情的召喚更大於人體標籤的誘惑。譯者將兩方的尖銳磨擦、緊張對峙，變為中國文人遊覽山水時慣見的相互唱和。⁶⁵ 於是，原本不守信用的導遊反而恪守職責，出現於他

64 David Livingstone, "Deserted by Guide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84.

65 關於中國文人集體的遊歷活動之研究，可見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

實為缺席的虛克江場面，與立溫斯敦「放歌震天地」。事實上，原著不乏立溫斯敦與當地人之友情的記載，可是譯者卻未如實譯出，⁶⁶ 卻於此良辰美景渲染文人的酬唱傳統，將兩人的脆弱情誼置於永恆時空的座標：「百年之後，文物益盛，俾此邦之人永知今日，有余二人偕游之蹟可乎」，將中國文人酬唱的事蹟，置入無限敞開的時空，表現有限與無限的對照，進而突顯宇宙人世的變遷流轉，顯得深沉雋永，令人讀來心嚮往之。從倫開派受之子的出場到離去，譯者一再美化人物形象，如「雅好奇異，聞有遠人至，即來相迎」；而他向立溫斯敦索取螺殼以獻給妻妾一事，⁶⁷ 卻變為「以獻我母，博堂上歡顏」、「貪而不違於禮，且事母孝，能承順其志，亦可謂雅人矣」，達到「可謂彬彬有禮，善為辭令」、「雖非上國衣冠，而絕不似黑人野性」的形象改造。（〈虛克江〉，29b）

作為一本訴諸「Researches」的非洲傳記，立溫斯敦有意壓抑自己的情感，如初入非洲時與當地人的隔閡、妻小離開非洲時的不捨等，僅以數行文字帶過，避免內在情感的流露。此不意味著立溫斯敦缺乏個人情感，恰好相反，他選擇於私領域的書信中宣洩真切的情感。就他寫給家屬與友人的親筆書信（見圖八），恰能反映其內在深切的憂患與期許。⁶⁸ 譯者背道而馳，渲染

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3(2000.9): 1-44；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12): 235-285；吳振漢，〈明末山人之社交網絡和遊歷活動——以何白為個例之研究〉，《漢學研究》27.3(2009.9): 159-190。

66 此如原著記述生的（Shinte）為立溫斯敦繫上珍貴的螺殼時說：‘There, now you have a proof of my friendship’，可是譯者卻將友情的見證變調為寶物的誇炫：「相對幔中，各炫其物，評衡不能置，至詞窮乃去。」（〈遇生的始末〉，10a）David Livingstone, “The last and greatest Proof of Shinte’s Friendship,”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25.

67 David Livingstone, “Guides prepai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83.

68 1841年，立溫斯敦剛探入庫魯曼，未完全適應，在〈給父母與姐姐的信〉（“Letter to: Parents & Sisters,” 1841.9.29）中提及“I am never pleased with the progress I make, the natives do jumble their words so together & then they are so stupid at understanding if there is any blunder in my sentences. But I hope soon to overcome. I shall after returning live entirely amongst them & speak not a word of English, I must conquer. Yesterday a man came to carry medicine for his wife whom I had just been to see. I gave him instructions to let her have it

與張揚原著實有意節制的情感，將傳主置入中國文人的情感模式，如遊覽古蹟或荒蕪之地時必定「發思古之幽情」、「今昔對比」，不免歎感嘆一番。譯著第五十則描述立溫斯敦遊覽生撲里冷羅按大（St. Paul de Loanda）古城，原著以「state of decay」輕描淡寫，⁶⁹ 譯者卻發思古之幽情：「素有城池，極鬧市大鎮之觀」，「地運盛衰，桑田滄海」，「頽然圯敗，荒寂之象，令人撫今追昔，有盛衰之思已」；（〈島城養疴〉，41b）第四十四則以剪裁場景、虛構記憶的方式強化羈旅感傷的色彩，刻意讓立溫斯敦行經魯意（Lui）與魯威（Luare）泉水處時「憶余前在美國曾經密昔昔卑地，其境有溪澗數帶，旁拓荒地，草色芊緜，景象宛然在目，因慨然思，游蹤無定，歲月迴殊，行自傷也。」（〈鐵波威〉，37b）事實上，立溫斯敦未曾赴美，只是以作為地理概念的「密昔昔卑」比較非洲泉水，⁷⁰ 譯者卻將之變為實際的昔往經歷，渲染漂泊無依、歲月不定的感慨。

在「逞才肆情」的詩學視角下，譯著彰顯或發明各種符合中國文學傳統

immediately. Before I could say stop the fellow had it whisked into his own stomach.”（「我未曾滿意我取得的進展，當地人說話是那麼含糊不清，也愚笨到無法察覺我在言詞上的任何失誤。我希望可盡速克服當前困境。在不使用任何英文的前提下，好好融入他們的生活。我必須達成。昨天，我剛診斷完一名婦女，她的丈夫來取藥，我囑咐他立刻讓妻子服用藥物，結果在我措手不及之下，那個男人就逕自把藥吞了！」）1852年，立溫斯敦將妻小送到開普敦後安排他們上船返回英國，隨後在寫給兒子的信〈給羅伯立溫斯敦的信〉（“Letter to: Robert M. Livingstone”, 1852.5.18）指出：“You went away with Mamma to England and I hope Jesus has taken you safely all the way to England. I don't know yet but you must write me a letter and tell me. I am very sorry. I shall not see you again you know I loved you very much. I like or love you still. Do you love me? Do you remember me sometimes?”（「我祈求主耶穌保護你們母子在返回英格蘭的路途上平安。我不知道我的祈願是否有效，請你務必寫信告訴我。我感到愧疚，我可能不會再見到你，你應知道我非常愛你。我會永遠愛你。你呢？有時會想起我嗎？」）

關於立溫斯敦的書信，可見「Livingstoneonline」網頁，就各地圖書館與檔案室有關立溫斯敦的信件電子化，且展示立溫斯敦手筆原件的掃描檔。分別見：<http://www.livingstoneonline.ucl.ac.uk/view/transcript.php?id=LETT37>（2014.3.28 上網）。

<http://www.livingstoneonline.ucl.ac.uk/view/transcript.php?id=LETT302>（2014.3.28 上網）。

69 David Livingstone, “The City of St. Paul de Loanda,”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426.

70 David Livingstone, “Tala Mungongo,”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407.

的情感面向。譯文第二十七則乃是中國哀悼傳統的迴響，⁷¹ 描述立溫斯敦行至摩全（Mozinkwa）家，「各道契慕」，遊覽「蔬果草木種植皆得宜」的花園，忽逢摩妻「土色新封，知其死未久」的墳墓，「其妻之賢且慧而豔，生時篤愛，伉儷無間，言故悼亡之情逾於尋常」。（〈摩全〉，16b、17a）核對原著，立溫斯敦與摩全初見，摩妻非但未逝，反而殷勤招待客人，甚至囑咐立溫斯敦抵達西岸後帶回西人之布。一直到立溫斯敦從西岸返回時才發現摩妻已死，摩全則不知去向，按當地人習俗，丈夫在愛妻死後拋棄家園，任由樹木、花園、房舍毀壞。⁷² 譯者違反原文秩序，將摩妻的死亡提前，重構情境、對話與動作，揣測摩全將妻子埋在家園之理由：「朝夕可以臨視，宛轉其側」，又渲染鰥夫因思念亡妻而「悲不自勝，聲淚俱下」的形象，虛構主客互動的場景：「余乃慰之，至再嚙啣始止」，（〈摩全〉，17a）深化摩全淒楚感人的哀悼情懷。

在「疾病」書寫上，亦可見原著與譯著的差異。原著以病理學視角描述疾病之成因與傳播，如探討瘧疾、痢疾、昏睡病等肆虐因由，書名頁甚至出現病蟲圖像（見圖九）。譯著抽離研究視角，鋪張渲染病主的淒風苦雨，呼應「病客無主人，艱哉求臥難」、「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瘧病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等文學傳統習見的「病主」書寫。⁷³ 譯文第三十七則描寫立溫斯敦之病，原文只是輕描淡寫：「I was too ill」，⁷⁴ 譯者卻以兩百多

71 關於中國文學的哀悼傳統，可見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何維剛，〈魏晉文人挽歌的文化考察——以《文選》所收錄之陸機〈挽歌〉三首為考察中心〉，《中臺學報·人文社會卷》22.1(2010.9): 9-30 等。

72 David Livingstone, "Mozinkwa's pleasant Home and Family,"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38. 此外，立溫斯敦在書中另一處記錄了自己從西途返回時摩全之妻死亡的訊息：「We did not find our friend Mozinkwa at his pleasant home on the Lokaloje; his wife was dead, and he had removed elsewhere. He followed us some distance, but our reappearance seem to stir up his sorrows.」（我們無法在摩全位於洛卡羅澤的舒適房子找到他。他的妻子已過世，而 he 已搬到其他地方。他保持著一段距離跟在我們身後，看來我們的重逢激發起了他心中的傷感之情。）David Livingstone, "Small Fish,"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519.

73 三首詩分別出自於孟郊〈路病〉、白居易〈病中詩十五首·初病風〉與杜甫〈病後過王倚飲贈歌·瘧疾〉等。

74 David Livingstone, "Insubordination Suppresse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75.

字宣揚衰弱病體：「余忽體倦，無復興致，不事出游」、「天時水土欺我未已，常致疾病」、「余羸疴之體，素不禁感」、「病中不能食，則往往忍飢，無以調衛精神，內元愈弱」；（〈黨人違教〉，26a）第五十則更透過主從對立，虛構病主孤苦無依的處境：就在立溫斯敦「日漸疴瘠，顧影骨立，跋涉之苦，幾不能耐」時，從人「見余病不起，心渙散矣。行李所携，凡餼糧之屬，煩費無度」。（〈島城養疴〉，41b）事實上，就在立溫斯敦患病時，從人非但沒有「心渙散矣」、「煩費無度」，反而尋得劈柴、賣柴、卸貨等工作，勤快刻苦，手腳敏捷，日出而做，日入而息。⁷⁵ 譯文忽略傳主與從人沿途克服各種磨難與謠言而建立的情感，⁷⁶ 逕自透過主從的對立，凸顯立溫斯敦的「病主」形象。

就上述所述，從原著到譯著的轉向，涉及深層結構的轉變：原本反映立溫斯敦個人價值辯證的「傳教」、「旅行」與「研究」架構，導入譯者更為擅長與讀者更感興趣的遊記脈絡。譯者對於「研究」、「傳教」的淡化與「旅行」的變調，實忽略了立溫斯敦有意公開宣示的價值理念：作為探入非洲傳教的傳教士，「旅行」、「研究」與「傳教」並不相違背。譯者有其核心關注，注入中國詩學視角，發揮文人逞才肆情的慣性，闡釋發明各種情感姿態，如放歌酬唱、哀悼懷古等，遂使得一本具有研究意涵的非洲記述變為高度文人化的非洲遊記。

五、接受視野：晚清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的凸顯

1860、1870 年代，正值英美各界關注立溫斯敦行蹤之時，無論是立溫斯敦喧囂塵上的失蹤傳聞或是施登萊不辭千里尋覓立溫斯敦的消息，都成為新聞媒體的聚焦點。在全球化的媒體傳播下，晚清中國人士、來華傳教士與 1870 年代的留美學生，藉由新興的報刊媒體與出版著作，傳播「立溫斯敦」，開啓中國文化界對立溫斯敦的接受。雖然，立溫斯敦之聲名無法與彼時

75 David Livingstone, "Find Employment in collecting Firewood and unloading coal,"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424-425.

76 在路途行進時，立溫斯敦備受各種謠言的離間分化，如指他一旦抵達西岸後即將拋棄從人，從人性命危在旦夕。可見："Fears of the Makololo,"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420-421.

廣受傳播的冒險家哥倫布匹比，⁷⁷ 可是其探險非洲的事蹟亦引發相當的關切。本節將追蹤晚清文化界論及立溫斯敦的觀點，進而思考箇中的偏重與策略，勾勒時人的接受視野。

1867 至 1871 年，潛入非洲探勘冒險的立溫斯敦蹤跡杳然，從被殺害、中彈到埋骨蠻荒等傳言不絕於耳。⁷⁸ 戰地記者施登萊在 *New York Times* 的贊助下，前往非洲，終在 1871 年 10 月 23 日於烏濟集 (Ujiji) 尋得鬚髮斑白、身體羸弱的立溫斯敦，共處五個月，一直到隔年三月離開非洲。⁷⁹ 立溫斯敦拒絕返國，在泥濘荊棘的非洲叢林中步履蹣跚地探進，即或得靠從人抬走，卻矢志不移，一直到 1873 年 5 月，客死異鄉。立溫斯敦的死亡訊息捲起輿論熱潮，促成連鎖效應，以致於論者指出立溫斯敦之死的貢獻並不隨著死亡而告終。⁸⁰

聚焦於晚清文化界，由丁韞良、艾約瑟和包爾騰等教士創辦的《中西聞見錄》，闢有「各國近事」一欄，刊出立溫斯敦失蹤乃至死亡的訊息。該刊物在立溫斯敦傳聞發酵的年代，亦加入傳播的行列，如 1872 年第 5 期報導施登萊前往非洲協尋立溫斯敦的消息：「去歲美國斯但利前往，將伊所繪圖籍及家報寄回。」1874 年第 23 期報導立溫斯敦的噩耗：「茲查斯敦之死，在去年三月間。」雖然，刊物報導無法與西方媒體同步，可是相隔只有數月，反

77 關於「哥倫布」的傳播，可見俞旦初，〈哥倫布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近代史研究》1993.1: 117-129；顏健富，〈雜混、獵奇與翻轉——論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清華中文學報》10(2013.12): 57-116。

78 此如 1867 年，*New York Times* 先後報導美國某領事館發佈「立溫斯敦於非洲死亡」、「立溫斯敦被謀殺」的消息、*Timaru Herald* 報導立溫斯敦探險隊與當地部落交戰時因槍傷而死；1870 年，*Sacramento Daily Union* 報導立溫斯敦已死並當地部落巫師下葬。分別見：“Death of Dr. Livingstone,” *New York Times* (1867.3.22); “The Report of the Murder of Dr. Livingstone,” *New York Times* (1867.4.6); “The Fate of Dr. Livingstone,” *Timaru Herald* (1867.3.25); “Dr. David Livingstone,” *Sacramento Daily Union* (1870.2.12)。

79 關於施登萊尋找立溫斯敦的事蹟，可見施登萊出版於 1872 年的傳記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 including four months residence with Dr. Livingstone*，第十二章“Intercourse with Livingstone at Ujiji”至第十五章“the Final Fareware”有詳細的記述。

80 William Garden Blaikie, *The Personal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 (New York: Harper, 1881), p. 461. Blaikie 用一章的篇幅“Posthumous Influence” (pp. 461-473) 討論立溫斯敦死後的影響，如促使英國議會強勢通過廢除奴隸案，逼迫中東回教國家簽署停止奴隸買賣的條約。

映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文化界在新興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接受西方訊息的速度。更可觀察的是：該報導有意切合中國讀者的偏好，著重立溫斯敦葬禮儀式與身後評價：以「一匹夫而邀榮賜葬之地」，乃是「國人尊為聖所，凡君主踐祚之初，必於是行冠冕禮焉」，「並垂不朽」，跟中國人重視的隆喪厚葬、死後哀榮、永垂不朽等意識不無關係。⁸¹ 此原屬「各國近事」的新聞報導，卻以中國史傳論贊的筆調總結立溫斯敦的一生：「斯頓初不過一傳教士，而通醫者耳，在阿非里加多年，始則宣揚聖道，救濟世人，繼而設法禁止販賣人口，終則不避艱險，探尋泥祿河源，以廣地學，務期終竟厥功，至於百折不回，死而後已。是其所以得與昭賢之列者，亦以其躬備智仁勇三達德也」，⁸² 凸顯傳主兼具的傳教士、醫生、禁奴者、探勘家等多重身分，甚至以「智仁勇」之倫理期待將立溫斯敦概括為中國理想人物的形象。

除切合中國倫理外，彼時媒體對立溫斯敦的禁奴貢獻有目共睹。英國議會雖早於 1833 年 8 月 28 日通過廢除奴隸制（Slavery Abolition Act 1833）法令，可是未能徹底彰顯效果，立溫斯敦之死促使英國國會更積極推動非洲的禁奴條約。由英美基督教傳教士出版的《中西教會報》連續刊出〈非洲傳教救奴〉、〈非洲禁止販奴〉、〈非洲求英護庇〉、〈非洲擄人為奴〉等文，響應禁奴條約。其中，〈教化非洲〉聚焦於立溫斯敦的「救奴」貢獻：拯救「或役為僕隸，或販之于人為奴」之慘況，「告諸英人，求其立法，禁民相讎，又求教會多派教士，分往其地，相與化導，以革舊時惡習」。⁸³ 立溫斯敦作為「禁奴者」的形象恰好切合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中國人的憂患與期許，面臨喧騰的美國排華事件，⁸⁴ 遂使時人普遍關注立溫斯敦的「禁奴」事蹟。1903 年，沈惟賢與高尚緝《萬國演義》以通俗化的歷史演義特別關注立溫斯敦的禁奴事蹟：「（立恒士敦）查察非洲里人的苦況。回國之後，苦口演說，就造成一個

81 此又如 1891 年由傳教士林樂知主編的《中西教會報》刊登〈教化非洲〉提及「李引斯登」：「葬於諸名人兆域，一如中國賜葬之制，蓋重其人，遂隆其禮也。」

82 清·丁禮良，〈各國近事〉，《中西聞見錄》第 5 期（1872），頁 20-21；第 23 期（1874），頁 23。

83 佚名，〈教化非洲〉，《中西教會報》第 3 卷第 27 期（1893），頁 27-29。

84 1882 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限制外來移民的排華法案，1902 年又將原設有時限的排華法案無限延長，引發華社的憤慨。關於「排華」事件可參見張慶松，《美國百年排華內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無量功德，救得億兆里人脫離了苦海。這個功德，就在勸禁販奴的一事。」⁸⁵

若回溯中國人對於立溫斯敦的介紹，早於 1870 年代，王韜〈探地記〉探討「李溫斯敦」探勘非洲的意義，反映深沈的文化視野，乃是彼時較詳盡介紹立溫斯敦的文章。該文先指出探入非洲的荷、葡、英人大多聚居於「沿海之濱」，「若洲之內地，從未有人深入之者」，立溫斯敦穿越「一望迷漫、苦無勻水」的沙漠，「沙漠近處築屋而居」，恰能揭開立溫斯敦的「探地」意義。雖然，立溫斯敦居所「迭遭荷蘭人劫掠」，「外出遇獅傷其右臂」，卻無阻於其探入非洲的決心，「過一湖名艾彌」，見非洲「內有多國」，如「最信鬼，亦最信藥」的麥哥羅羅（Makololo），率領部落土著，將象牙運到西岸海濱，「售於英人，得價甚厚」，又沿「潺皮西江」（Zambesi），「遊歷洲之中土，直達東西兩境海濱」，抵達東岸後，「火輪船自英來接立，欲暫返英京，乃命百人在海濱相待」。王韜之文確能掌控立溫斯敦的事蹟，但也明顯可見揚長避短的論述策略，對於立溫斯敦自 1840 至 1856 年的首次非洲之旅有詳盡的描述，卻對其往後充滿挫折苦悶的探勘避重就輕，敘述語調從事蹟描述轉向事理議論：「阿非利加一洲儘多膏腴厚壤，惜土人不知地利於耕種之道茫然也，且其人多散居，生齒亦不繁者。有智者導之，則是洲生產之富不亞於他洲」，避開立溫斯敦的改革成效。針對立溫斯敦對於尼羅河之源的誤判，王韜語多同情，試圖緩頰：「黑人多孱弱，不任驅使其考尼祿河源也」，「或謂其所尋之河源非尼祿河，乃根歌河水向西北流入於大西洋，然其考求內地之功，非人所能及也。」⁸⁶

1879 年，《申報》尊聞閣主人囑咐的翻譯任務，促成百年來唯一一部立溫斯敦著作的中譯本——《黑蠻風土記》。此著作已如前述由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乃是譯自立溫斯敦的第一本非洲記述：*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就譯文之〈序〉，可見譯者沈定年對立溫斯敦「躬踐其地，親見其事」的客觀筆調給予好評：「每至一地，必製一圖，繪其所見，民物風俗，而因自敘其游歷之跡，自始迄末，凡書數十萬言，印而行之，微特英人之慕阿洲者，咸樂購閱之。」（〈序〉，1b）可是，在中國的禮教傳統、詩學結構與西方殖民論述的介入下，中譯本侷限了「徵而

85 清·沈惟賢、高尙縉，《萬國演義》（上海：作新社，1903），卷 52，頁 32。

86 王韜，〈探地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頁 9954。

有實」的非洲視野。原著的研究視角變為中國文人的情感模式，中國禮教傳統取代宗教意識，立溫斯敦的「教士」身分受到淡化。即或是可讓譯者渲染奇景的片段，如立溫斯敦等人進入麥哥羅羅傳教，播放神奇幻燈片（magic lantern），逼真的影像讓居民逃之夭夭，⁸⁷ 卻不見於譯著。關於原著與中譯本的差異，梁啓超（1873-1929）〈讀西學書法〉頗能一針見血：「英人立溫斯敦，居非州內地二十年，諳其地利，習其人情。近年歐人剖分非洲，半用其言也。今彼之著述，譯成華文者，有《黑蠻風土記》一書，敘述瑣屑、無關宏旨，蓋必尚有他書未譯出者也。」⁸⁸ 雖然如此，中譯本反映十九世紀中國文人對於非洲記述的接受視野，仍然具有研究價值。

隨著《黑蠻風土記》的輾轉出版與各界人士對傳主的評介，二十世紀初的文論、小說到畫像等不同媒介，時而可見「立溫斯敦」的身影。最顯著的是各作者從立溫斯敦身上攝取一可振衰起敝、力挽狂瀾的形象，回應彼時對於「冒險」精神的提倡。⁸⁹ 立溫斯敦勇闖非洲的事蹟恰能符合梁啓超的期待視野：「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為白人殖民地。則英國之立溫斯敦。Livingstone 其人也。」⁹⁰ 梁啓超將之描繪成開天闢地、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形象。1904年，《新民叢報》刊出〈大探險家立溫斯敦：開闢亞非利加洲：照片〉，照片中的人物西裝畢挺，眼神探向遠方，手放軍帽，流露正義凜然的神情（見圖十）。

就「冒險」脈絡而言，時人將立溫斯敦探入非洲的事蹟與探勘新大陸的航海家哥倫布、繞行地球的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登陸澳洲的傑頓曲（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等人相提並論。梁啓

87 David Livingstone, "Magic Lanter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22.

88 梁啓超，〈讀西學書法〉，江都于寶軒驢莊輯，《皇朝蓄艾文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頁23-35。

89 清·梁啓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於《新民叢報》倡導屬「公德」之一的「冒險」精神：「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清·中國之新民，〈新民說五：第七節、論進取冒險〉，《新民叢報》第5號（1902.4），頁1。

90 同上註。

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將漢代出使西域的張騫（前 195- 前 114）、班超（32-102）置入西方探險家的系譜時指出：「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關新地之豪傑是已。哥倫布士之開亞美利加也、倂頓曲之開澳大利亞也、立溫斯敦之開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歐洲人種所以漲進之第一原因也。」⁹¹「立溫斯敦」等人作為可促進「世界文明」、「人種所以漲進」的「豪傑」形象，引發讀者的興趣，並發信給《新民叢報》：「（問）貴報第八號傳記〈張班傳〉第一頁引哥倫布士、倂頓曲、立溫斯敦關新地事，以代表之。三人之時代事實，鄙意中絕無所諳，雖在他處見過影響語，尙茫茫難考。」報刊編輯的回應指出：「（答）哥倫布士為尋得亞美利加洲之人，本報已登其遺像，稍讀西史者，心中應無不有斯人，不必多述；倂頓曲，其官則『倂頓』（武員之末職也，又西人通稱船主亦以此名），其名則「曲」也，覓得澳洲及檀香山後，為檀香山土蠻所殺；立溫斯敦首游歷亞非利加洲內地，其游記中國亦有節譯本，乃十餘年前上海書坊所印，名為《黑蠻風土記》者是也。」⁹²在編輯與讀者的答問中，立溫斯敦探入非洲的事蹟與哥倫布發現美洲、倂頓曲發現澳洲並列，顯然鞏固其作為「發現」非洲者的印記。

隨著「小說革命界」的改革呼籲，文學創作介入國家改革的進程，「小說」成為改革「民／國／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的載具。⁹³1905年，晚清小說作者頤瑣連載於《新小說》的長篇小說《黃繡球》描述：「你看哥倫布不過一個窮人，單身萬里，四度航海，才尋著一塊新世界；瑪志尼撐一隻小船，繞過地球，冒了萬死，三年功夫才開通太平洋航路；立溫斯頓探險到亞非利加洲的內地，進了沙漠，蒙了瘴癘，同那土蠻猛獸交鬥，幾十年不怕不怯，才能叫那非洲全境歸他英國所關。」⁹⁴當「立溫斯頓」探險亞非利加的事蹟進入新小說文體時，被提煉為具有激勵性的精

91 中國之新民，〈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新民叢報》第8號（1902.5），頁1。

92 飲冰（梁啟超），〈問答〉，《新民叢報》第26號（1903.2.26），頁3。

93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期（1902.11），頁1。

94 清·頤瑣，《黃繡球》，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25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第16回，頁311。同樣的訊息也反映在《黃繡球》第27回（頁399）：「豈但是哥倫布，要能把那一處做得同我們這裡一樣，簡直是開通太平洋航路。為兩半球鑿成交通孔道的麥哲倫！漸漸的一處一處做開去，都成了我們的殖民地，不更就是英國的立溫斯頓開通非洲全部的本領嗎？」

神符碼，旨在鼓舞小說人物探索家國出路。1908年，《學海》創刊號刊出王桐齡（1878-1953）的小說〈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則將場景聚焦於「李秉鐸」1860年代後半期的非洲探勘與1870年代正是立溫斯敦失蹤、「司徒雷」冒險協尋的事蹟，彰顯立溫斯敦後期的非洲探索（此乃是《黑蠻風土記》所無涉獵與王韜語焉不詳的部分），指出立溫斯敦的事蹟比起埃及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尼羅河、土人更「不可思議」，預告全文的「獵奇」色彩。在冒險犯難的結構中，小說呈現種種「不可思議」之事件，如探勘「地理學上之新發見」的潭閣泥加湖，因「奔馳過度」而「臥床不起」。1871年，當歐洲各國紛紛謠傳其歿時，施登萊帶著大隊人馬協尋，「路上絕糧」、「大夥喪氣」，抵達溫陽炎境時罹患傳染病，又遇鄰境米蘭部蠻人入侵，遍地烽火。在一連串的試煉中，施登萊抵達無極脊，「兩探險家之會見」。王桐齡以歎噓慨嘆的筆調將立溫斯敦的晚年窘境比擬為蘇武（前140-前60）的海上牧羊、報國無門，最終壯志未酬、客死異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⁹⁵

1909年，由英國霍偉氏（Rev. H. Haws M. A. 1838-1901）著、任保羅譯、上海廣學會出版的《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Travels of David Livingstone in Africa*）（見圖十一、十二），乃是第一部立溫斯敦傳記的中譯本，以相對完整的架構呈現立溫斯敦的面貌。傳記譯本共分九章，從第一章「初次播道斐洲」到最後一章「李文司敦末次遊斐」，詳述立溫斯敦探入非洲的遭遇，乃是晚清各報導、譯本、創作中最能完整反映立溫斯敦事蹟的著作。原著霍偉是牧師，「廣學會」則屬英美基督教會的出版機構，譯者任保羅則屬「廣學會」的固定翻譯班底。⁹⁶從傳記作者到出版社的屬性，不難理解此書對於立溫斯敦「播道斐洲」的定調：「第一章、初次播道斐洲」、「第二章、初次播道斐洲續記」、「第三章、初次播道斐洲再續記」、「第六章、三次播道斐洲」，有意標榜立溫斯敦的「播道者」身分。然而，立溫斯敦1840年首次探入非洲時乃屬「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教士身

95 清·王桐齡，〈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學海（甲編）》第1號（1908.2），頁129。

96 任保羅曾譯傳教士林樂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十集》（1903）、罕忒（William Wilson Hunter, 1840-1900）《大英治理印度新政考》（1904）等。

分，而後兩次卻出現身分上的轉變：1858年第二次探入非洲時多出「英國領事」(British Consul)的官方身分、1865年則在「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贊助下探勘非洲尼羅河。⁹⁷此傳記始終將立溫斯敦牢釘於「播道者」的位置，宣揚其根基於靈魂內裡的傳教信仰，穿越語言、文化、位階等隔閡，獲得土著的敬佩：「我今得李氏不啻於我父之外又得一父矣」、「黑人之在黑暗中者，亦能蒙贖罪之恩而得救，皆李氏之所賜矣」。⁹⁸

由上可見，從1879年沈定年《黑蠻風土記》對立溫斯敦「非洲探勘記」的譯述，發展到1909年《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的傳記譯本，反映立溫斯敦其人其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概況。晚清人士透過議論、小說、傳記等書寫，或將立溫斯敦置入基督、哥倫布、麥哲倫、倂頓曲等西方脈絡，或列入蘇武、張騫、班超等中國行列，恰可見不同的訴求如何引導不同的形象剪裁，呈現特定的期待視野。整體而言，晚清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的接受，從最初的消息報導發展到長篇闊論的說明，從議論文章的事蹟說明發展到小說文體的敘事展演，反映廣化與深化的趨勢。

六、結 語

鴉片戰爭的爆發使得立溫斯敦未能如米憐、麥都思、馬禮遜、郭實臘、理雅各、裨治文、林樂知、傅蘭雅、李提摩太等傳教士般抵達中國傳教。不過，其探勘非洲的足印隨著全球化的傳播版圖而橫跨各大洲，滲入中國文化界。在報刊媒體、晚清中國人士、來華傳教士、1870年代留美學生的推波助瀾下，開啓中國文化界對立溫斯敦的接受視野。稍遺憾的是：將近一個多世紀以降，此接受視野尚未受到注意，各種原始資料逐漸銷聲匿跡。事實上，該譯著折映各種文化訊息，饒具意義。循此，筆者進出各地圖書館與檔案室，廣蒐博採，試圖重現十九世紀後半葉立溫斯敦之著作進入中國文化界的

97 關於立溫斯敦的兩次身分轉換，Tim Jeal “Her Majesty’s Consul” 與 “The last Visit Home, 1864-1865” 有詳細的討論，見 Tim Jeal, *Livingsto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5), pp. 185-194, 277-290.

98 清·霍偉著，任保羅譯，《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上海：上海廣學會，1909)，頁10、125。

途徑與方式，以及譯本在翻譯實踐中的轉向及箇中可能投射的意涵。

誠如上述，該譯本可以反映晚清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文化地圖：從 1872 年的中國留美學生計畫到中國報刊與出版社的發展，促成立溫斯敦之非洲探勘記得以翻譯出版的契機。作為 1872 年第一批泰西肄業計畫的史錦鏞，留美期間，正是歐美熱切關注立溫斯敦的時刻。史遭遣返中國後，來到報業正蓬勃發展的上海，替申報館口譯立溫斯敦備受稱譽的第一部非洲著作，接而又由中學基礎深厚的沈定年「述文」，恰能反映中國早期翻譯西方著作時所採取的合作模式。從「譯語」到「述文」，乃是過度簡化的意譯版，共有六十一則譯文，遠未能反映立溫斯敦自 1840 到 1856 年探入非洲的路線。雖然，譯本有各種省略缺失，卻逢中國關注域外地理學之時刻，屢獲出版傳播的機會，包括申報館的《黑蠻風土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黑蠻風土記》與上海時務書局重編印製的《泰西風土記》。

固然，相比起「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施登萊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的《三洲遊記》的虛構幅度，⁹⁹《黑蠻風土記》有一定的翻譯依循，可是譯本卻在若干層面激烈調動原著的方向。雖然，述文者沈定年帶著「實而有徵」的翻譯自覺，「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可是就其翻譯結果而言，更多時候「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形成翻譯原則與實踐結果之間的矛盾。對於翻譯研究而言，如此的鴻溝與斷裂更能開啓研究的視角，如論者所言：「清末民初譯者作為一個群體，經常被指對原著不忠實，又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缺乏認識，這種結論其實都是基於新文學運動所建立起來的關於西方文學建制和文學翻譯的種種想法，論者往往一舉抹煞了翻譯時期的社會背景和文化需求。」¹⁰⁰「翻譯」涉及潛藏於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文化規範、民族心理等元素，遂使來源語進入目的語的翻譯過程，為適應特定社會語境而出現改寫或操縱的情形。譯本的不忠實處反映意識型態與詩學觀的介入，彰顯彼時的社會語境與文化心理等。

99 關於《三洲遊記》的偏離，最明顯者乃是譯者逕自加入虛構的人物，使得非洲歷險記述被敘事化，可參照張治，〈「引小說入游記」：《三洲遊記》的逐譯與作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1: 150-162。

100 孔慧怡，〈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06。

1870年代翻譯出版的《黑蠻風土記》，反映晚清時期中西學術初步接觸時的概況。譯者不同於立溫斯敦的位置，必然調動源語文本的方向。立溫斯敦以倫敦傳教會的教士身分探入非洲，面臨教會人士的質疑挑戰，在傳記中更是凸顯自身的傳教意圖。譯者因不具有傳主的焦慮，將立溫斯敦有意標舉的教士身分與傳教意圖，轉為彼時中國知識分子有意訴求的新世界觀，長篇闡論各大洲的歷史地理學與器物發展等。更複雜的是：此新世界觀又層層糾纏著傳統禮教觀與西方殖民論述，在「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等位階差序下，譯著為美化作為強國子民的傳主，特意渲染非洲人的賤醜瘴惡、獐頭鼠目、貪鄙猥褻等形象，強化既定的愚昧、落後、神秘的標籤，形塑鮮明的非洲人體標籤。

譯者逕自迎拒取捨，撕裂原著具有平衡作用的「傳教旅行」與「研究」視角，又將「傳教旅行」變為中國詩學視角下的「文人遊記」。具有文采與舊學背景的沈定年替譯本注入中國文人的韻律節奏、意象美感、文人旨趣等，在非洲場景虛擬山水景觀、春日和融圖，疊入中國文人習見的酬唱、哀悼、懷古、病痛等文學傳統，闡釋發明各種情感面向，讓原本樸實無華的非洲記述變為變為「逞才肆情」的文人遊記，恰能反映中西文學、學術對於「理性」與「情感（感性）」的不同認知與態度，遂使得立溫斯敦頗具傳教與研究色彩的非洲記述轉為中國文人的美感取向。

除觀察譯文的轉向外，本文亦追蹤晚清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其人其事」的討論。透過各種議論、小說、傳記等文章，可見到晚清作者因不同的位置與訴求而對「立溫斯敦」有特定的形象裁剪與事蹟彰顯。相比起《中西聞見錄》、《中西教會報》、《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等傳教士著作有意宣揚的「宗教」精神，刊登於《新民叢報》、《新小說》、《學海》等文章則是刻意壓抑立溫斯敦的教士身分，強調「發現新大陸」、「冒險拓荒」、「禁奴」等事蹟，標榜立溫斯敦的冒險家、探勘家、醫生、禁奴者、教化者等身分形象。總而言之，本文重探各種史學與文學材料，試圖透過《黑蠻風土記》此一譯本的發生語境、翻譯實踐乃至晚清作者的傳播概況，重塑十九世紀末乃至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的接受視野。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丁韞良，〈各國近事〉，《中西聞見錄》第5期，1872，頁20-21；第23期，1874，頁23。
- 清·佚名，〈教化非洲〉，《中西教會報》第3卷第27期，1893。
- 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臺北：廣文書局，1962。
- 清·王韜，〈探地記〉，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9953-9954(11b-12a)。
- 清·西泠野樵，《繪芳錄》，《晚清民國小說研究叢書》第43冊（此系列共51種75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 清·沈定年，〈序〉，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黑蠻風土記》，未列出版資料。
- 清·馬德新著，馬安禮譯，《朝覲途記》，《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第95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 清·沈惟賢、高尚縉，《萬國演義》，上海：作新社，1903。
- 清·梁啓超，〈讀西學書法〉，江都于寶軒驢莊輯，《皇朝蓄艾文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 清·郭連城，《西遊筆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 清·郭高燾，《巴黎與倫敦日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6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清·霍偉（Rev. H. Haweis M.A.）著，任保羅譯，《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上海：上海廣學會，1909。
- 清·頤瑣，《黃繡球》，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25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
- 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釋，《海錄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 清·中國之新民，〈新民說五：第七節、論進取冒險〉，《新民叢報》第5號，1902.4，頁1-11。
- 清·中國之新民，〈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新民叢報》第8號，1902.5，日本：新民叢報社，1902，頁29-39 / 1-12。
- 清·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期，1902.11，頁1。

清·飲冰(梁啟超),〈問答〉,《新民叢報》第26號,1903.2.26,頁101-104/1-4。
清·王桐齡,〈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學海(甲編)》第1號,1908.2,頁119-130。

“Death of Dr. Livingstone,” *New York Times*, 1867.3.22.

“Dr. David Livingstone,” *Sacramento Daily Union*, 1870.2.12.

“LIVINGSTONE: Herald Special from Central Africa Finding the Great Explorer,” *The New York Herald*, 1872.7.2: 1-3.

“The Fate of Dr. Livingstone,” *Timaru Herald*, 1867.3.25.

“The Report of the Murder of Dr. Livingstone,” *New York Times*, 1867.4.6.

Livingstone, Davi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a Sketch of Sixte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a Journe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Loanda on the West Coast; Th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 Down the River Zambesi, to the Eastern Ocean*. New York: Harper, 1858.

Hughes, Thomas. *David Livingstone*. London: Macmillan, 1891.

Blaikie, William Garden. *The Personnel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 Chiefly from His Unpublished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in the Possession of His Family*. New York: Harper, 1881.

二、近人論著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 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 2001〈形象〉,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孔慧怡 2000〈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88-117。

毛文芳 2000〈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3(2000.9): 1-44。

王立 1999《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田正平主編 1991《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何維剛 2010〈魏晉文人挽歌的文化考察——以《文選》所收錄之陸機〈挽歌〉三首為考察中心〉,《中臺學報·人文社會卷》22.1(2010.9): 9-30。

吳振漢 2009〈明末山人之社交網絡和遊歷活動——以何白為個例之研究〉,《漢學研究》27.3(2009.9): 159-190。

- 巫仁恕 2005 〈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12): 235-285。
- 李漢秋 2010 〈《儒林外史》的版本及其沿遞〉，《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13。
- 沈慶利 2009 〈現代中國異域小說之界定及發生發展概況〉，《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28。
- 金觀濤、劉青峰 2008 〈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頁 40-53。
- 俞旦初 1993 〈哥倫布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近代史研究》1993.1: 117-129。
- 祝均宙 2004 〈中國近現代中文期刊概述：發展脈絡及特色〉，《上海圖書館館藏近現代中文期刊總目》，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頁 1587-1603。
- 張文亮 2003 《深入非洲三萬里——李文斯頓傳》，臺北：校園書房。
- 張 治 2007 〈「引小說入游記」：《三洲游記》的逐譯與作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1: 150-162。
- 張慶松 1998 《美國百年排華內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 灝 2003 〈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14.2(2003.6): 1-42。
- 章 清 2006 〈晚清「天下萬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及其意義〉，《二十一世紀》94(2006.4): 54-62。
- 郭延禮 1998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發展脈絡及其主要特點〉，《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頁 21-56。
- 陳平原 2005 《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熊月之 1997 〈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彙聚〉，《近代史研究》1997.4: 257-271。
- 劉 禾 1999 〈國民性理論質疑〉，《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評綱要》，上海：三聯書店，頁 65-104。
- 錢鋼、胡勁草 2004 《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上海：文匯出版社。
- 顏健富 2012 〈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從「文學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1(2012.9): 1-44。
- 顏健富 2013 〈雜混、獵奇與翻轉——論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清華中文學報》10(2013.12): 57-116。

- 羅志田 2009 〈天下與世界：清末人士關於人類社會認知的轉變——側重梁啟超的觀念〉，《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30-54。
- Abramova, S. U. 1979. "Ideological, doctrinal,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pp. 16-30.
- Eaton, Jeanette. 1947. *David Livingstone: Foe of Darkness*. New York : W. Morrow.
- Gentzler, 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Jeal, Tim. 1985. *Livingsto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Lefevere, Andre. 2004.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Mackenzie, Rob. 1993. *David Livingstone: The Truth Behind the Legend*. Eastbourne: Kingsway Publications.
- Rhoads, Edward J. M. 2011.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Walton, Henry. 1925. *Livingstone: Fifty Years After*. London: Hutchinson & Co.

三、網頁資料

- 「西敏寺」官方網站：<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our-history/people/david-livingstone> (2014.3.28 上網)。
- 「Livingstoneonline」網頁，分別見：
- “Letter to: Parents & Sisters” 1841.9.29 (〈給父母與姐姐的信〉) <http://www.livingstoneonline.ucl.ac.uk/view/transcript.php?id=LETT37> (2014.3.28 上網)
- “Letter to: Robert M. Livingstone” 1852.5.18 (〈給羅伯立溫斯敦的信〉) <http://www.livingstoneonline.ucl.ac.uk/view/transcript.php?id=LETT302> (2014.3.28 上網)

黑蠻風土記	
英國立溫斯敦著	南海史館鑄瑞臣譯語
山陰沈定年鮑山述文	武進陳以真璞卿校字
目錄	
大獅	獸名氏族
善牲妙法	廓老觀獵
卵殼取水	蒸米糊
蒸米眺覽	魯井
獸災	獅牛鬪
嗎素鼠蛇	軟木
露坐聽訟	農器
羚羊	海里麥江紀盼
美西紀遇	熟地

圖一 《黑蠻風土記》1879 年版目錄頁



圖二 立溫斯敦的非洲行跡路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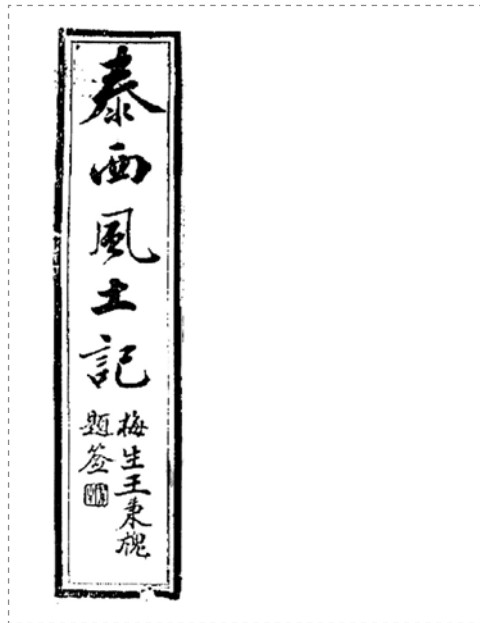
黑蠻風土記

余早歲輒好游歷思欲窮地球五洲之勝而力每不逮竊歲乃遊於阿非利加洲之境洲地極東半在歐羅巴東南而亞細亞之西南廣袤里數經緯線度志海國者動許言之不復登詞其地人物大畧樸實少文蓋靈秀之鍾毓主此始將窮絕故遠不及諸洲而其在四大洲中山川形勢亦不少遜且拓地廣長皆在萬五千里有奇則其中人民之繁富都會之盛大物類之雜奇古蹟之留遺舟車所至不勝盤紮惜其地之居中有大沙漠人迹罕至自來游此洲者所至猶邊境也余以遠人深入其境風俗不知言語不通道路不辨於熙熙攘攘之中輒見怪怪奇奇之事往往觸踰蹈危幾不自保至今追憶猶覺寒心譬如談虎者能令滿座變色然古人游詠之作亦自不廢暇輒筆之於書拉雜不成體格今復檢行囊出舊稿次第之得數十條自初至以及將歸蹤跡可考言不能盡縮之以圖至川陸道里行止月日未遑具詳聊以誌風土備人物俾後

黑蠻風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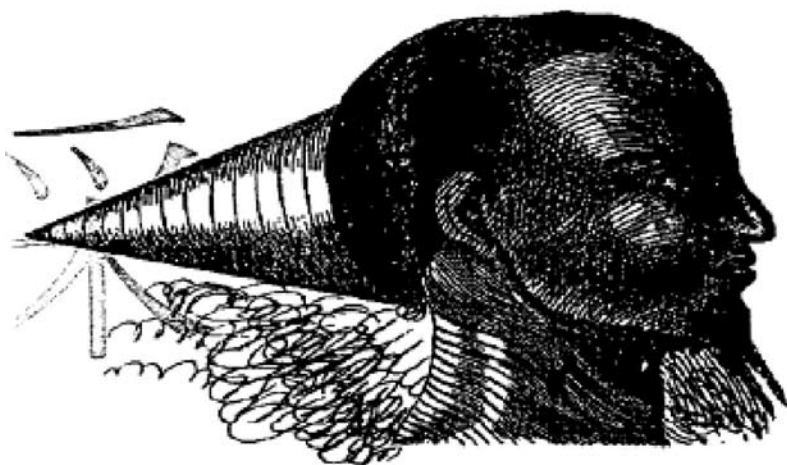
英國立博斯敦著

圖三 《黑蠻風土記》內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版)



圖四 《泰西風土記》書名頁(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

式罩髮長首新倍



圖五 「倍新酋長髮罩式」



式蓋兜木來哥按

圖六 「按哥來木兜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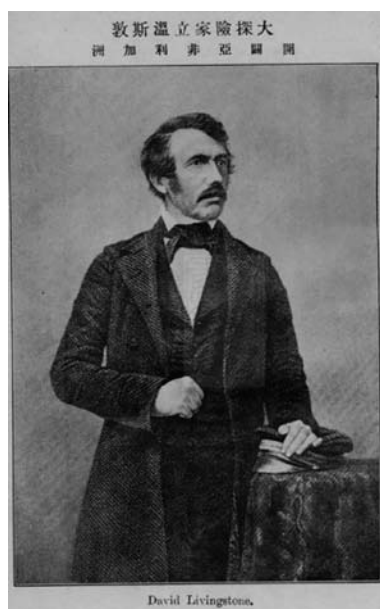
圖七 「蓋米湖」圖片

Liverpool on the 30th of this month for St. Paul. I would proceed to the interior as rapidly as possible, I do not know exactly what his instructions are to be but I suppose he will try to reach Lake Lincoln if the Lualaba turns out to be the Congo which I fear it will, it seems to be a much easier & safer way to come down it, in a boat than tramp your weary way back to Zanzibar. suppose you would to escape the threatening scoundrels. By the way they say that 30,000 of Stanley's book has been sold in England & it is out of print, I could not get a copy in Glasgow 2 day for 5 money, I thought your book did well, but John Murray if you are poor hands at the art of selling compared to Stanley. I learned a grand wrinkle from Stanley, when you come home write your book if you will take a trip to New York & write one chapter of it there Stanley says that will make it good copy right in America & you can easily get "fiv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for it, I was talking the o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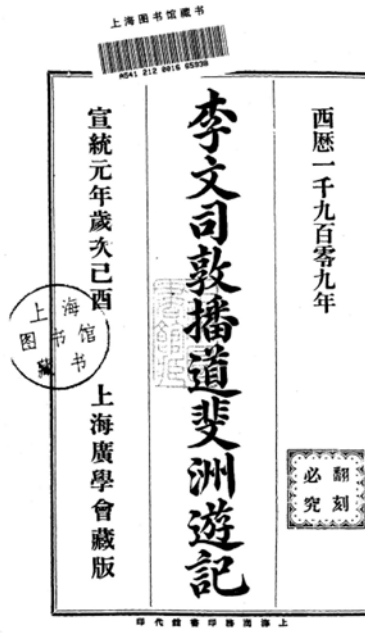
圖八 立溫斯敦親筆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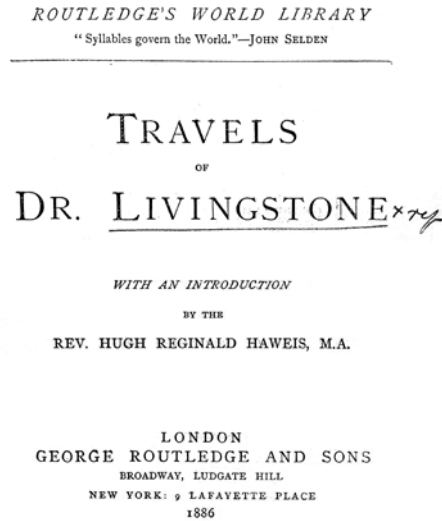
圖九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書名頁



圖十 「大探險家立溫斯敦：開關亞非利加洲」照片



圖十一 《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書名頁



圖十二 *Travels of David Livingstone in Africa* 封面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avid Livingstone'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 Late-Qing Cultural Circles

Guan Kean-Fung*

Abstract

This study tracks the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of the Scottish missionary David Livingstone's writing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a work seldom studied by scholars at the time. Although the work of missionaries such as William Milne, Walter Henry Medhurst, Robert Morrison, Charles Gutzlaff, James Legge, E. C. Bridgman, Young J. Allen, John Fryer, and Timothy Richard had received some attention in scholarly circles, David Livingstone, who had originally intended to go on mission to China after reading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s *Appeal of China*, was ignored. Having instead travelled to Africa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Opium War, David Livingstone revealed inland Africa to a Western world unacquainted with the region, attracting attention from various quarters. His book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entered late-Qing cultural circles via its translations *Heiman fengtu ji* 黑蠻風土記 and *Taixi fengtu ji* 泰西風土記. Based on neglected historical sources and literary material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context, ideology, poetic structure, and reflected meanings of these translation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avid

* Guan Kean-Fu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Livingstone's writing i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s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David Livingstone, Africa, exploration, late Qing, translation